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

謝明良*

【摘要】淇武蘭遺址位於臺灣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村的交界，自2001年發現以來已知出土有近三萬件的外國高溫炻器和施釉陶瓷，其年代跨幅早自十六世紀前期或更早，晚迄近現代。本文則是梳理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陶瓷標本，其主要產地來自中國，個別標本出自東南亞泰國或緬甸。中國陶瓷種類不少，除了景德鎮製品之外，還有大量的福建漳州窯製品，其種類有青瓷、青花、青花五彩和低溫鉛釉陶器等。出土陶瓷的年代可印證文獻所載，早在十六世紀後期已有中國漁船進出臺灣雞籠等地。另外，自中國攜入臺灣的施釉陶瓷於淇武蘭遺址墓葬中，其和住民噶瑪蘭人製作的低溫素燒陶器之間有著替代、互換的現象。

關鍵詞：噶瑪蘭人、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漳州窯、泰國陶瓷、華南三彩

位於蘭陽平原北側的淇武蘭遺址，行政區域屬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村的交界。該遺址自2001年5月發現以來至2003年5月結束考古工作為止已經多次調查，所開挖探坑計262個，發掘面積3,814 m²。遺址出土文物種類不少，扣除重達3噸計約50餘萬件的低溫素燒陶器，另有近三萬件的高溫炻器和施釉陶瓷，低溫燒陶器當中，包括部份施罩鉛釉的所謂鉛釉陶，而高溫燒成的施釉器之標本釉色則包括青釉、白釉和黑褐釉等，裝飾工藝技法則見刻劃花、印花以及釉下青花或釉上彩繪，內容豐富，不一而足。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淇武蘭遺址出土施釉陶瓷的年代跨幅早自十六世紀前期或更早，晚迄近現代。限於篇幅，同時考慮到十七世紀台灣隨著外力的入侵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是臺灣史上一個關鍵期，因此本文擬先梳理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陶瓷。就臺灣史的發展而言，此一時期包括了臺灣史前史最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階段，以及荷西、明鄭、清國等外來政權，可確認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外國陶瓷產地主要來自中國，個別標本則出自東南亞泰國等地。中國陶瓷的種類相對豐富，除了低溫鉛釉陶之外，另有高溫燒成的施釉器，後者包括醬釉、褐釉、白釉、青釉等單色釉以及青花、釉上彩等彩瓷。由於標本數量龐大，以下只能分項擇要敘述之。

一、青花瓷

就產地而言，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青花瓷除了少數來自中國江西省景德鎮之外，絕大多數屬福建省窯系製品。

（一）景德鎮窯

景德鎮青花瓷以一件推測可能是玉壺春瓶頸肩部位殘片的年代最早（圖1，P25508C014）。標本內外施釉，胎釉結合緊密，青花發色鮮明，器表的青花卷草紋與日本沖繩縣勝連町濱出土的青花玉壺春瓶相近（圖2），① 後者瓶下腹所見變形蓮弁等繪飾因與江西省新建縣正統二年（1427）朱盤烓墓青花罐一致，② 龜井明德因此認為勝連町濱青花玉壺春瓶為十五世紀作品。參酌土耳其炮門宮博物館（Topkapi Saray Museum）藏帶「大明正德年製」款的青花瓷碗的卷草紋（圖3），③ 我推測上述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片的相對年代可能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初期之間，最遲不晚於正德（1506－1521）年，是淇武蘭遺址所見年代最早的外國陶瓷之一。

於碗外壁繪纏枝靈芝，內底複線弦紋當中飾折枝花的敞口小碗是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景德鎮瓷窯常見的碗式之一（圖4，P25806C003）④ 及（圖5，P22005C002），⑤ 如2003年馬來西亞海域發現的相對年代約於1620至

① 龜井明德，《九州の中國陶磁》（福岡市：財團法人西日本文化協會，1986），頁84，圖41。
② 古湘等，〈介紹幾件元明青花瓷器〉，《文物》，1973年12期，圖版柒。
③ 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3・明後期・清（京都：同朋社，1982），圖19a。
④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81、頁175，圖版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30年代的*Wanli Shipwreck*（萬曆沉船）即見此類景德鎮青花碗（圖6），⑥ 另從沉船發現的於折枝花上書寫「壽」字的殘片，⑦ 可以推測淇武蘭遺址所見碗心折枝靈芝上方之難以辨別的繪飾有可能即「壽」字的變體。

於內底繪江濱垂釣的圈足盤（圖7，P12002C007）⑧ 是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常見的母題，日本長崎家庭裁判所建地⑨ 或萬才町遺址⑩ 都曾出土類似標本（圖8），後者年代在十六世紀末至1630年代之間。⑪

青花紅綠彩標本為瓶罐類殘片，內壁無釉，外表係於釉下飾青花弦紋，施罩透明釉以高溫燒成之後，再於器表繪飾紅綠彩進行二次低溫釉燒（圖9，P000SCC656），⑫ 亦即係以紅彩描繪牡丹，花弁上方以勾勒方式留白，旁飾綠彩。類似的釉上彩繪圖紋可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十七世紀明末福建省漳州窯系罐（圖10），⑬ 不同的是後者無青花飾，其胎釉亦較淇武蘭標本粗製。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另一件白瓷釉上繪紅綠彩飾的標本器壁較薄，內外施罩精純的透明白釉，表飾紅綠相間的變形蕉葉（圖11），類似的紅綠彩蕉葉飾頻見於十六世紀中後期景德鎮彩瓷（圖12）。⑭

於器外壁施褐色調紫金釉，內壁繪飾青花的所謂巴達維亞瓷（Batavia Ware）標本，是繼臺灣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⑮ 臺南熱蘭遮城等遺址之後，⑯ 經正

---

⑤ 景德鎮窯址出土類似標本可參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12期，頁47，圖24。

⑥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 128, no. 6347.

⑦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p. 265, Ref. 22.

⑧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2，圖版318-319。

⑨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長崎家庭裁判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2），圖7-7、8。

⑩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萬才町遺跡—寺院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3），頁52，圖版20-3。

⑪ 大橋康二，〈萬才町遺跡出土の陶磁器〉，收入前引《萬才町遺跡》，頁7。

⑫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2，圖版381右。

⑬ 齊藤菊太郎，《吳須赤繪　南京赤繪》陶磁大系45（東京：平凡社，1976），彩圖2。

⑭ 矢島律子，《明の五彩》中國の陶磁9（東京：平凡社，1996），圖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考古發掘所得具有特色的標本之一（圖13，P25507C001）。⑰ 這類因經常由巴達維亞轉販各地而得名的景德鎮褐釉、青花雙色釉瓷的年代跨幅不小，至少可早自十五世紀，晚迄越南海域十八世紀前期*Ca Mau Shipwreck*（金甌沉船）甚至近現代都可見到。⑱ 不過，若就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卷口小杯之器式、內底青花繪飾和外底青花雙圈內的圖記看來，因與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日本出島荷蘭商館遺跡，⑲ 以及中國福建省十七世紀末期碗礁一號沉船打撈上岸的標本一致（圖14），⑳ 故可保守估計其相對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亦即清代康熙中後期。

（二）福建窯系

本文所謂福建窯系製品主要來自俗稱的漳州窯，是中國福建省南部九龍江中游西部漳州地區瓷窯的總稱，其包括今漳州市、龍海（1960年由龍溪縣與海澄縣合併）、雲霄、漳浦、長泰、南靖、平和、華安、詔安和東山等縣瓷窯製品。㉑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福建窯系青花瓷數量龐大，繪飾題材至

⑮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3分（1993），圖版32。

⑯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王城試掘研究計劃（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06），頁2-229，圖版101。

⑰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3，圖版382-383。線描圖參見頁96圖25。

⑱ Nation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 off the Coast of ViteNam* (HaNoi, 2008), pp. 350-352. 另外，關於此類陶瓷於臺灣的出土情況及研究史可參見：王淑津，〈巴達維亞瓷的風格故事〉，《故宮文物月刊》，328（2010），頁38-49。

⑲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荘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頁140，圖110之5、6。

⑳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碗礁一號出水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209，圖127。

㉑ 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少有花卉（葉紋、纏枝花卉等）、文字（壽、魁等）、人物（垂釣、官人、騎馬、舟行等）、禽獸（螭、龍、鳳、鷺等）、幾何紋（排點紋等）和卡拉克類型（Kraak Porcelain），以及僅於碗盤口沿飾青花弦紋、裝飾簡略的製品。就其器形而言，以各式碗居大多數，亦見盤、罐類以及所謂玉壺春瓶等立件，試擇要敘述如下。

1.花卉

以葉紋作為主要紋飾的葉紋盤（圖15，P25805C007）是十七世紀清代初期青花瓷常見的母題，如相對年代約於1690年代越南海域發現的荷蘭籍*Vung Tau Shipwreck*（頭頓沉船）（圖16），㉒ 或福建省東山島十七世紀沉船，㉓ 即見此類青花葉紋兼漢字題詩盤。臺灣歷史時期遺跡如臺南安平熱蘭遮城遺址、社內遺址或高雄左營鳳山舊城等遺址亦曾出土十七世紀福建窯系葉紋盤（圖17），特別是後者左營鳳山舊城出土之帶有「太平年興，乙卯冬記」葉紋盤，可以參酌1980年代中國江西省窖藏出土之伴出「康熙年製」青花龍紋杯，而將盤內壁所見乙卯干支訂定於康熙乙卯年，即西元1675年。㉔ 青花葉紋是十七世紀中國沿海地區如江西、福建或廣東等省份瓷窯常見的裝飾母題，安溪龍涓珠塔或漳州窯系五寨鄉通坑窯、詔安朱厝窯等均見此類標本。㉕ 就胎釉和青花發色的特徵而言，淇武蘭遺址的葉紋盤有較大可能來自福建地區窯場，但精確的產地比定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調查來解決。

青花菊花纏枝紋碗（圖18，P25903C016）是包括淇武蘭遺址在內的臺灣遺址常見的標本之一，福建翰苑窯尾崙窯址出土的減筆纏枝菊花紋深腹碗之碗式和畫風和淇武蘭遺址標本較為近似，㉖ 由於類似的青花碗曾見於福建省晉江縣

㉒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nos. 883-886.

㉓ 陳立群，〈東山島冬古沉船遺址初探〉，《福建文博》，2001年1期，頁36，圖3。

㉔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臺灣史研究》，3卷1期（1996），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219-222。

㉕ 關於中國十七世紀葉紋飾或葉形器的流行情況可參見：謝明良，〈關於葉形盤—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26（2010），頁36-55。

臺灣本體藝術期刊資料庫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鄭氏集團叛將水師提督施琅墓，㉗ 以及日本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等十七世紀遺址，㉘ 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後期。可以附帶一提的是，發掘印尼雅加達灣西部沿岸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群和舊河道遺跡時不僅見有青花菊花纏枝紋碗（圖19），同遺址且伴出了前述外褐釉內青花之巴達維亞瓷。㉙

遺址所見碗外壁以雙豎線做出開光式間隔，再於各隔間區塊中繪飾抽象花卉（圖20，P08303C008），㉚ 內底心畫蓮池鷺鷥的標本，可見於漳州平和縣花仔樓窯、五寨二壠窯等窯址（圖21），窯址報告書且將外壁之抽象花卉稱為「開光變體蓮弁」。㉛ 由於在雙豎線間隔出的區塊中飾花卉，意匠近似所謂的卡拉克瓷，參酌1950年代T. Volker著作所援引的一件於開光中飾蓮花和鬱金香的卡拉克瓷，㉜ 我認為報告書「開光變體蓮弁」的定名應該是正確的。類似的繪飾開光變體蓮弁的福建窯系青花碗，曾見於平戶荷蘭商館遺跡，㉝ 據說菲律賓八打雁（Batangas）海域*San Diego Shipwreck*（聖迭戈號沉船）也打撈出同類遺物（圖22）。㉞ 前者平戶荷蘭商館是1609年荷蘭獲得德川家康同意所設立的聯合東印度公司商館，自1641年由幕府下令將商館遷至長崎出島為止，被稱為

㉖ 安溪縣文化館（葉清琳），〈福建安溪古窯址調查〉，《文物》，1997年7期，頁63，圖12之2。

㉗ 葉清琳，〈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收入Ho Chui 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 81.

㉘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 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長崎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183集（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2005），頁66，圖58之756。

㉙ 三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1982），圖13-15。

㉚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1、頁176，圖版282-283。

㉛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頁43及頁54，圖31之7；頁86圖51之7；圖版76之5；圖版94之1右上。

㉜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1954), pl. Ⅶ-9.

㉝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遺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告－》（長崎縣：平戶市教育委員會，1988），頁48，圖21-42。

㉞ Jesus T. Peralta,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Philippines, 1993) 等圖錄未見，本文圖照是轉引自：盧泰康，〈臺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4（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9），頁240，圖1之33。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平戶時代。後者*San Diego Shipwreck*是於1600年12月14日遭受荷蘭旗鑑砲擊而沉沒的西班牙旗鑑，因其同時伴出了景德鎮卡拉克瓷，此顯示「開光變體蓮弁」青花瓷和可能做為其原型之所謂卡拉克瓷於時間上有所重疊，可說是同時並存的兩路商品。其實，*San Diego Shipwreck*陶瓷與淇武蘭遺址出土標本有頗多共通之處，比如說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罐殘片（圖23，P25609C027）之花葉造形即與*San Diego Shipwreck*所見俗稱的Albarello藥罐青花花葉相似（圖24），㉟ 結合淇武蘭遺址標本尺寸和器式特徵，不排除其可能是沉船舶載之頸肩飾繫耳的青花大口罐（圖25）般罐身殘件。另外，遺址出土的青花纏枝花卉亦有多種造型，有的係以沒骨繪出枝蔓，其上花卉採雙鉤描輪廓後再塗施青料，風格簡逸（圖26，P12203C001），趣味有如日本肥前天狗谷Ⅲ期（1650－1690）標本者（圖27），㊱ 但相對而言，淇武蘭墓葬出土的不少器形大致完整的玉壺春瓶，雖亦見此類簡逸型雙鉤花卉（圖28，M006C002），㊲ 但多數屬豪邁的粗筆沒骨畫法（圖29，M004C001）；㊳ 類似器式的漳州窯青花玉壺春瓶曾見於菲律賓Palawan（巴拉望）海域沉船遺留，後者陶瓷種類與淇武蘭遺址標本多有重疊，如前述碗心繪蓮池鷺鷥的青花標本，以及以下將提及的於內底畫戴帽官人和花鹿圖紋的青花瓷盤即為其例。㊴

㉟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1996), pp. 354-355.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Founde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rtPostAsia Pte Ltd, 2007), p. 152, pl. 150.

㊱ 有田町史編纂委員會，《有田町史 古窯編》（佐賀縣：有田町，1988），圖版78之2。

㊲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9、頁186，圖版343。線描圖參見頁90，圖21左。墓葬資料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68-71，圖版M006-7係誤植M030陪葬之玉壺春瓶，應與同圖錄頁165，M030-9對調。

㊳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86，圖版342。另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60-63、圖版M004-5。

㊴ Franck Goddio,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wind first, 1988. 此轉引自森村健一，〈漳州窯系製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觀とその意義〉，收入《漳州窯出土青花、赤繪瓷與日本出土中國外》（大阪：堺市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1994），頁246-255。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2.卡拉克類型

以邊欄間隔或者再於其中做出開光，內繪紋飾的所謂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是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中期常見的貿易陶瓷，目前可確認的燒造此一樣式的中國瓷窯，主要來自江西省景德鎮以及福建省漳州地區窯場。遺址出土的卡拉克型標本均屬盤類（圖30，P24903C008、圖31，㊵ P05404C017），從標本胎、釉和繪飾風格看來，均屬漳州窯系製品（圖32）。㊶ 1613年赴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補給物資卻遭受葡萄牙船擊沉的荷蘭*Witte Leeuw Shipwreck*（白獅號沉船），㊷ 或越南海域發現的相對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前期的*Binh Thuans Shipwreck*（平順沉船）也都發現類似作風的漳州窯卡拉克類型製品（圖33）。㊸ 另外，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一片於開光內飾花卉的殘片（同圖30，P24903C018）則與前述平戶荷蘭商館遺跡出土的標本紋樣大體一致（圖34）。㊹

3.文字

以漢字做為作品主紋飾，大致有兩種表現方式。其一是於碗盤類內底飾一圈弦紋，圈內書寫「福」、「壽」、「魁」等吉祥文字，另一則是在碗類外壁略帶規則地間隔錯落裝飾數目不一的減筆「壽」字，整體有如散點式的圖樣。以吉祥文字做為主紋飾其實見於明代晚期各類工藝品，其同時也是景德鎮窯常見的裝飾母題。不過，淇武蘭遺址的該類標本則均來自漳州窯系，對照1990年代出刊的《漳州窯》窯址報告書，則「福」字碗（圖35，P13004C002）見於秀篆、洞口和二壠，㊺「壽」字碗（圖36，P02001C009）見於秀篆、二壠、大壠和花仔樓，㊻「魁」字碗（圖37，P25608C018）見於秀篆、二壠、花仔樓、碗窯

㊵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76、頁162，圖版196-197。

㊶ 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等（栗建安），〈平和縣明末清初青花瓷窯調查〉，《福建文博》，1993年1、 2合期，頁164，圖2之2。

㊷ 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uem, 1982), p. 201, no. 11852, 11855.

㊸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ustralia: Christie's, 2004), no. 1047, p. 19, no. 19-21.

㊹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遺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告－》，頁93，圖22-5。本文彩圖取自：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航路アジアへ—鎖國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頁74，圖16-4。

㊺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6-2、37-1、96-2。

㊻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9-5、9-6、16-2、38-1、67-1、74-2、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和梅林等瓷窯，[47] 可知是漳州窯系各瓷窯陶工喜愛的題材並以此外銷。比如說，合併日本慶長二年（1597）以來建設的四外町而成的榮町遺址即見「壽」字盤（圖38），後者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半。[48]

於碗外壁散點式的書寫減筆「壽」字的標本（圖39，P13103C002），[49] 也見於坪水等漳州地區瓷窯（圖40），[50] 福建漳浦市坑村康熙四十年（1701）歿之鄭經叛將黃性震墓或石榴鄉墓可見同類標本（圖41、圖42）。[51] 從而可知，該類口沿微外卷的壽字碗之年代可晚至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期。另外，相對於淇武蘭遺址標本碗內壁幾何形裝飾帶內心之抽象圖紋，前述黃氏墓青花碗書「佳」字，石榴鄉墓青花碗碗心則書「雅」字，而碗心書「佳」或「雅」字外壁「壽」字的青花碗還見於臺南熱蘭遮城遺址[52] 或日本鹿兒島縣吹上濱遺留標本。[53]

4.龍

龍紋可區分成走龍和蟠龍，前者僅存龍尾，夾雜雲、火飾於碗外壁（圖43，P25610C018），後者見於盤類內底，頭上無角，屬所謂的螭龍（圖44，P10106C005），[54] 漳州窯系中的碗窯山或大壠等瓷窯燒製有類似標本（圖45），[55] 日本長崎勝山町遺址（圖46）[56] 或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父，往來於博多、臺

---

[47]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6-2、49-2、65-2、96-2。

[48]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圖版12之30。

[4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79-80、頁166，圖版224-225。線描圖參見頁83，圖16碗9。

[50]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5-5左下。

[51] 王文徑，〈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4期，頁72，圖二之4、6。

[5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前引《王城試掘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頁2-97及頁2-221圖版77。

[53] 大橋康二，〈鹿兒島縣次上濱採集の陶磁片〉，收入《三上次男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陶磁篇（東京：平凡社，1985），頁285，圖1-25。

[5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6、頁182，圖版317。

[55]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31-5、74-2。

[5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圖版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之間經商致富的著名資本家末次興善於文祿元年（1592）所建設的市鎮—興善町遺址也都出土了類似圖紋的標本，[57] 後者時代約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前期。另外，沉沒於1609年的英格蘭Virginia公司旗艦*Sea Venture Shipwreck*也出土了類似的標本。[58]

5.人物

人物圖紋當中既有寓意吉祥富貴者，有的甚至具備故事情節。如遺址出土（圖47，P25607C118）之同時也見於臺南社內遺址[59] 或前述日本長崎平戶荷蘭商館[60] 及榮町遺址[61] 的碗內底繪飾著深衣、戴官帽的持笏男子像，即為一例。從榮町遺址以及漳州大壠窯址出土標本戴帽官人下方繪有帶斑點的鹿（圖48），[62] 可以確知整體圖像是以諧音寓意「加官（冠）受祿（鹿）」，而淇武蘭遺址標本人物下方輪廓造型難以辨明、內置斑點的圖紋，無疑是斑鹿的抽象簡化形式。這類圖紋除了福建漳州、[63] 廈門瓷窯之外，[64] 江西省景德鎮亦有生產。[65] 從景德鎮麗陽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黎氏墓伴出的類似作品，[66] 結合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日本平戶商館遺址出土標本，推測其流行於十六世

---

[57]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興善町遺跡—東邦生命保險第2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9），圖版399-9。

[58] Allan J. Wingood, "Sea Venture. An interim report on an early 17th century shipwreck lost in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1: 4 (1982), pp. 333-347.

[59]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頁38，圖版40。

[60]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う發掘調查の報告—》，頁48，圖40-4。

[61]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遺跡》，圖版12-29。

[62]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74-2。

[63] 吳其生等，《華安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85。

[64] 陳娟英，《廈門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143。

[65]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前引〈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頁47，圖26。

[66] 故宮博物院等（樊昌生等），〈江西景德鎮麗陽碓臼山明代紀年墓〉，《文物》，2007年3期，頁45，圖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紀至十七世紀前半期。從胎、釉和圈足整修痕跡看來，淇武蘭遺址標本屬漳州窯製品。

北宋元豐五年（1082）初秋七月蘇軾協同友人泛舟至黃州城西赤鼻磯下磯窩湖，同年十月再次與友人舟行赤壁，分別完成於兩次赤壁之行的前、後赤壁賦，既是蘇軾個人文采的巔峰，也成了傳誦不衰的千古名文，黃州赤鼻磯因此又有東坡赤壁的呼稱。從文獻記載看來，早在蘇軾在世之時已有和赤壁賦相關的畫作在其交友圈中流傳，就現存實物而言，傳北宋喬仲常《後赤壁賦圖卷》、南宋楊士賢《前赤壁賦圖卷》就分別以圖像來捕捉前後赤壁二賦的情景，赤壁賦圖同時也是宋代以來，特別是明代繪畫以及工藝作品常見的母題。遺址出土的赤壁賦圖青花碗雖係殘片，但仍可清楚地識別出舟棚內有三人，正中一人頭戴大帽，應係著所謂東坡巾的蘇軾（圖49，P07408C004），[67] 東京國立博物館即收藏有帶《後赤壁賦》的漳州窯青花赤壁圖碗（圖50）。[68] 另一方面，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人物標本當中還包括騎馬人物般難以判明原本是否具有敘事性圖紋的青花瓷器。遺址所見此類標本均屬碗類，碗口沿外翻，以下弧度內收，下置圈足，騎馬人物繪於碗外壁（圖51，P07105C009），[69] 個別人物可識別出頭戴平沿帶穗高帽（圖52，H08700C004）。從以往學界對於明代青花碗的器形排序可知，約成立於十五世紀中期的口沿外翻鼓腹碗至十六世紀前半已如福建牛屎礁出水青花碗式般，碗腹鼓起趨於和緩，下置略外撇的圈足。[70] 由於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前期菲律賓海域發現的*Gujangan Shipwreck*亦見碗腹弧度相對和緩的碗式（圖53），[71] 所以我也同意前引隨著時代的推移碗腹鼓起趨於和緩的看法。不過，淇武蘭遺址騎馬人物青花碗碗腹已呈內收形

---

[67] 謝明良，〈十七世紀中國赤壁賦圖青花瓷碗—從臺灣出土例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35（2011），頁78-93。

[68] 東京國立博物館，《染付　藍が彩るアジアの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9），頁70，圖60。

[6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1、頁174，圖版273。

[70] 森達也，〈十五世紀後半—十七世紀の中國貿易瓷—沉船と窯址發見の新資料を中心に—〉，《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2009），頁154。

[71] Roxanna Maude 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態，故其年代顯然應更晚。結合湖北省秭歸廟坪萬曆十三年（1585）墓出土的同式青花騎馬人物碗（圖54），⑫ 我推測淇武蘭遺址此類標本的相對年代約在十六世紀後期。

與前述底心書寫「魁」字寓意功名的吉祥文字，淇武蘭出土的所謂「魁星點斗」則是以圖像的形式來表示狀元及第、功成名就（圖55，P25508C048、P26004C005）。⑬ 做為北斗第一星（或斗杓四星）的魁星是司掌文運、合格中舉的守護神。「魁星點斗」圖像見於明代晚期各種材質的手工藝品，甚至於朝鮮王朝緙絲亦見類似圖像。⑭ 從胎釉特徵看遺址出土的這類標本產地應來自福建省漳州地區，如漳州坪水窯即生產有同類的標本（圖56），⑮ 另外漳浦窯亦見同類標本。⑯ 除了四川省彭縣窖藏出土報告書所稱的「猴戲盤」⑰ 其實即「魁星點斗」圖像，日本遺跡如前述長崎市栄町遺跡、勝山町遺跡（圖57）或仙台市元袋遺跡都出土了於內底繪飾「魁星踢斗」的青花瓷盤，⑱ 從伴隨出土的標本可知其相對年代均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

6.幾何形紋

以排點紋為例，淇武蘭遺址所見青花排點紋標本數量不少，其器形主要為弇口碗和碟，排點均飾於器外壁，內壁則僅於近口沿處和內底近澀圈處裝飾弦紋。從遺址出土排點紋標本的胎、釉、圈足整修痕跡，以及青花的色調，甚至於點紋造型本身及其排列方式或疏密度均不盡相同，說明其可能並非來自同一

⑫ 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等，《秭歸廟坪》（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249圖208及圖版82-4。

⑬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2，圖版320-321。

⑭ 玉蟲玲子，〈紙織畫小考〉，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朝鮮王朝（東京：小學館，1999），頁337，圖252。

⑮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5-5及頁23，圖13。

⑯ 王文徑，《漳浦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153-154。

⑰ 彭縣文化館，〈四川省彭縣南街醬園廠出土窖藏青花瓷器〉，《文物》，1978年3期，頁92，圖1。

⑱ 工藤哲司，〈近世初頭における仙台城下の輸入陶磁器〉，《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2009），頁126，圖16-J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窯場所生產（圖58，⑲ P26003C017、圖59，⑳ H07500C001）。福建境內漳州窯系㉑ 或安溪窯系㉒ 均生產有青花排點紋碗，日本遺跡如前述長崎市栄町遺跡、 ㉓勝山町遺跡、㉔ 金屋町遺跡㉕ 均出土類似的標本，其相對年代均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弦紋標本數量不少，器型以碗盤類居多，多數作品弦紋是飾於器內外壁近口沿處及近底處（圖60，P10102C001），個別作品如遺址出土的平底小罐殘件近底處亦見弦紋裝飾（圖61，P00402C005），類似器形的作品見於福建漳州窯洞口窯址㉖ 以及越南海域打撈上岸的十七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遺物（圖62）。㉗ 後者沉船亦伴出了器內外壁口沿及近底外飾弦紋的青花碗（圖63）。從窯址及沉船類似小罐看來，淇武蘭遺址裝飾有弦紋的平底小罐原亦應飾有其他紋飾，可惜標本已殘，原繪飾內容已不得而知。可以一提的是John Addis曾引用一則十六世紀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提及菲律賓村長收藏有很多杯及滿載符咒小罐的記事。即，1599年桑切斯神父（Father Gabriel Sanchez）提到保和島（Island of Bohol）有做為求籤問卜，和祭祀魔神、驅除妖孽病痛的小罐等用具。桑切斯神父決心去搗爛那些可憎的器具，破除迷信。在抵達該村時他親身取下那些杯和罐，因為伴隨他的土人都不敢觸摸，害怕激怒魔神而招致死亡；同時他們更迷信如果將那些器具拋到河裡，河裡的鱷魚便會憤怒因而對他們不利。㉘ 儘管菲律賓也曾出土包括漳州窯系在內的陶瓷小罐，

---

⑲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5、頁177，圖版290、291。線描圖參見頁86，圖18碗19。

⑳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3，圖324下左、325下左。

㉑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頁85，圖50之15。二壠窯址出土排點紋碗，以及吳其生等，前引《華安窯》，頁98。

㉒ 參見葉清琳，前引〈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頁83，圖版1之2、4。

㉓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前引《榮町遺跡》，圖版11-10。

㉔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前引《勝山町遺跡》，圖版11-3。

㉕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金屋町遺跡　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頁103，圖版19-40。

㉖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三四之1。

㉗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no. 1047, p. 31, pl. 168-178.

㉘ John Addis,〈中國瓷器—序〉，收入：*South-East Asian &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g Ko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79), pp. 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上述村長所收藏滿載符咒的小罐是否即漳州窯青花罐？其次，淇武蘭遺址漳州窯青花小罐是否亦具祭祀功能？目前已不得而知。

二、釉上彩瓷

淇武蘭遺址的釉上彩瓷主要是來自福建漳州窯系的製品，器形包括碗、盤和罐，均係於以高溫燒成的白瓷上施加紅、綠、黃等釉彩然後入窯二次燒成。以口徑逾30公分的大盤為例（圖64，P21503C011），[89] 其分別以綠釉和紅彩將盤內壁區分成幾個同心區塊，盤壁另飾開光，盤心彩繪紅色折枝花，旁飾以綠釉點飾成的葉片，類似構圖的釉上彩漳州窯系盤可見於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圖65）。[90] 遺址出土的另一件口徑近20公分的中型盤除了於盤內壁以紅彩飾網格紋，盤心紋樣漫漶不清，僅能識別出紅色花卉和不規則的綠釉粗線及斑塊（圖66，P05405C005），[91] 其盤內壁開光常見於傳世的漳州窯釉上彩作品（圖67）。[92] 另外，遺址出土的一件逾10公分的大盤口沿部分殘片，可見青釉釉上彩鳳鳥紋飾，其鳳首及前軀雖已不存，但仍可輕易地辨識出翅羽及呈三叉狀的尾翼，尾下方另有青釉花葉陪襯（圖68，P00501C004），類似的漳州窯鳳鳥紋見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盤心書「天下一」之五彩山水鳳鳥紋大盤（圖69）。[93] 據此可知淇武蘭遺址上述青釉鳳紋標本之青釉下方可能原亦有黑彩勾勒輪廓，只是已脫落殆盡。

---

[8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1、頁188，圖版352-353。線描圖參見頁92，圖22盤1。

[90]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7），頁28，圖15。

[9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1、頁188，圖版354-355。線描圖參見頁92，圖22盤2。

[92]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6），頁17，圖15。

[93]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 II》（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115，圖446。彩圖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前引《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頁16，圖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釉上彩瓷當中無疑是以一件廣口豐肩罐最引人注目，標本紅彩雖脫落殆盡，但仍可能從殘留痕跡復原出罐身飾綠釉開光，內飾花鳥（圖70，P13402C002）。[94] 無獨有偶，日本出光美術館亦收藏有造型、紋飾等各方面特徵均和淇武蘭遺址標本一致的漳州窯彩繪罐（圖71），[95] 從而可知遺址出土的標本罐肩部位原是繪飾獅子滾繡球，器身開光內飾長尾禽鳥立於太湖石上。另從出光藏品所見禽鳥咀呈三角形短尖喙，頭上置長冠羽之造型特徵看來，淇武蘭報告書所復原禽鳥之長尖形喙其實應為冠羽之誤。另外，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五彩碗是於碗內外壁近口沿處、內底近碗心處以及外壁腹下方近底處飾青花弦紋，外壁釉上彩飾紅綠彩花卉和變形蕉葉，其中紅彩繪飾的花卉已脫落殆盡（圖72，P25407C019）。[96] 從器胎不甚精純有氣孔以及青花發色略濁等推測，其有可能是漳州窯系製品當中較為少見的青花五彩器。

三、單色釉瓷

（一）安平壺

「安平壺」一名緣自1920年代以來臺灣臺南安平古堡一帶所陸續出土的施釉罐。這類罐的胎、釉或尺寸大小等特徵不一，但多數作品均呈直口、平唇、斜肩或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造型，器內外施罩灰白釉或略閃青色調的青白釉。它們於臺灣的出土分佈絕不限於安平一地，其產地或時代可能也不盡相同，不過由於安平地區的出土例較早為人們所熟知，並曾引起部分人士撰文討論，因此自然地就出現了「安平壺」這一名稱，[97] 沿用至今。淇武蘭出土的所謂安平壺標本數量極大，初步估計有數千片之多，仍保留其大致造型的

---

[9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92，圖版378。線描圖參見頁95，圖24。

[95] 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明14（東京：小學館，1976），頁240，圖248；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904。

[96]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2，圖版381左。

[97] 國分直一氏曾經提到：「當發掘熱蘭遮城就會出土俗稱的安平壺。」參見同氏《壺を祀る村》（東京：三省堂，1944），頁111。看來「安平壺」一名至遲在日本時代已廣為人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標本也近百件。該類標本有厚胎（圖73，P08602C006）[98] 跟薄胎（圖74，M036C001）[99] 二類，器足的造型也有平底或平底錐形內凹以及淺寬圈足的區別（圖75）。[100] 口沿部位多數無釉，但亦見施罩釉的標本。從口沿無釉的標本之口沿部位有的留有疊燒的痕跡，而圈足部位也經常可見疊燒痕可知，所謂的安平壺入窯燒造時是採口底摞疊的燒成方式，也因此除了最上方一件作品之外，口沿部位一般都不施釉。就器形而言，既有弧肩的作品，也有斜直肩者。釉色亦不盡相同，有的標本釉色青白，但多數作品釉色呈灰白或灰青色調，看來淇武蘭遺址的所謂安平壺標本應該是來自複數窯場所生產。另外，關於其年代，我曾於1990年代撰文考察日本遺跡以及包括*Witte Leeuw Shipwreck, Hatcher Shipwreck*等在內沉船打撈出的安平壺。以沉船紀年資料而言，最早的例子見於菲律賓海域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發現的薄胎弧肩作品，最晚的作品可見於越南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的厚胎斜直肩作品。[101] 檢證近年考古發現遺物，可知十七世紀確實是所謂安平壺的流行時代。比如說，前述越南發現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前期的*Binh Thuan Shipwreck* [102] 或中國福建平潭九梁礁沉船[103] 即見有安平壺，其次日本堺市江戶整地層（SKT263）出土安平壺的相對年代亦約為1650年。[104]

有關於安平壺的用途歷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不過前數年陳國棟曾針對安平壺提出一個饒富趣味的說法，他指出江樹聲已懷疑法佗退音（Valentijn）說「三燒」（Sampsoe）即「中國啤酒」（Chinese Beer）的說法，因此在翻譯《熱蘭遮城日誌》時，將之譯成「麥酒」。陳氏在此一提示之上，結合

---

[9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66-67、頁154，圖版150-151。

[9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88-193、頁193，圖版M036-7。

[10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68，圖12安平壺剖面圖。

[101]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頁75-106。

[102]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9, fig. 65.

[103]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平潭九梁礁明代沉船遺址調查報告〉，《福建文博》，2010年1期；栗建安，〈福建地區水下考古20年〉，《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頁39，左下圖。

[104] 森村健一，〈堺、閩南『泉南佛國』國際關係論〉，《關西考古學研究》，15（2007），頁165。另外，同氏聲稱出土的安平壺標本來自「福建省東門窯系」，此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查證。

臺灣本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文「Shamsoo」即「三燒」，也就是經過三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認為安平壺就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燒酒」的容器。[105] 我同意這個看法。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淇武蘭遺址的安平壺有的係出土於墓葬遺跡，其中編號108號墓出土標本口沿遺留有纏繞捆綁的草繩（圖76，M108C001），[106] 而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亦曾打撈出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而後再以藤莖捆繞壺頸加固的安平壺標本（圖77），為安平壺內容物之彌封保固方式提供線索。[107]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福建省邵武青雲窯址曾發現安平壺標本，標本以薄胎弧肩者居多，間可見到厚胎製品，釉色偏灰或青灰，個別標本有寬淺圈足（圖78）。[108] 淇武蘭遺址的薄胎弧肩作品，有的和紹武青雲窯址標本極為相似，但是否確屬該窯製品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查證。不過，綜觀淇武蘭出土的安平壺標本，可以確知其不會是同一時代單一窯場所生產，參酌可大致判明其相對年代沉船或陸上考古遺跡相關資料，或可推測淇武蘭遺跡薄胎弧肩作品標本之年代要略早於厚胎斜直肩標本。關於這點，近年江西南城縣黎家山七號墓出土的厚胎安平壺（圖79），[109] 因其伴出的青花太極八卦紋碗以及鳳紋盤等陶瓷與福建省平潭康熙年間碗礁一號沉船作品一致，[110] 可知七號墓的厚胎安平壺的相對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後期。鄰近福建北部邵武地區的江西南城縣出土安平壺一事確實耐人尋味，姑且不論南城縣七號墓安平壺是否來自福建地區瓷窯所生產？由於中國瓷窯遺跡往往缺乏紀年遺物，同時個別學者又對於邵武窯所見安

---

[105] 陳國棟，〈「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8（2004），頁2-9。另請參見：謝明良，前引《貿易陶瓷與文化史》，頁211。

[106]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55，圖版155。

[107]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21: 3 (1992), p. 233. 另外，清楚彩圖可參見：Christiaan J. A. Jö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2001), p. 151.

[108] 傅宋良等，〈邵武四都青雲窯調查報告〉，《福建文博》，1988年1期，頁19-22。另見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典藏福建邵武窯白瓷器標本。

[10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寬樂等），〈江西南城縣黎家山古墓群和斜窠古村落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10年2期，頁52，圖11之3。

[110]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號碗礁一號出水瓷器》，頁184，圖100及頁187，圖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平壺類型標本的相對年代存有疑慮，認為其或可早自十五世紀，[111] 甚至元代至明代初期。[112] 就此而言，南城縣清初墓葬之安平壺可為此式小口壺之相對年代提供線索。

（二）白釉

除了安平壺標本之外，淇武蘭遺址所見十七世紀的施罩白釉標本還包括了福建省德化窯白瓷。其器形種類包括瓶、壺（圖80，M021C001）[113] 、盒等。後者，白瓷蓋盒殘片（圖81，P03908C003），[114] 盒身上方有子口，盒蓋蓋面平坦，蓋面周邊模印雙弦紋，以下蓋沿飾菊瓣式棱，是明代德化窯白瓷常見的器式之一。[115] 從1960年代P. J. Donnelly著作所揭示的印模具可以確認，此類印花蓋盒是置於陶模中以 坯技法成形加飾而成的（圖82）。[116] 或許由於此類蓋盒是明代晚期的流行商貨，因此不少中國以外遺跡都曾出土，如前述日本長崎勝山町（圖83）、[117] 榮町[118] 或五島町、[119] 築町[120] 等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遺址均可見

[111] 森達也，前引〈十五世紀後半—十七世紀の中國貿易陶瓷—沉船と窯址發見の新資料を中心に〉，頁153。

[112] 趙嘉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古代外銷瓷—中國水下考古的工作與發現〉，《中國古陶瓷研究》，14（2008），頁10。

[11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9、頁196，圖版400。線描圖參見頁99，圖26罐。白瓷所出土M21墓葬內容，參見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24-129。

[11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9、頁196，圖版402。

[115]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德化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0），頁127，圖115-b；陳建中等，《德化窯》中，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54、146。

[116]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l. 46-A.

[117]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前引《勝山町遺跡》，圖12-21。

[118]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前引《榮町遺跡》，圖14-64。

[119]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五島町遺跡》（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1），圖15-8。

[120]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圖27-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至如沉船打撈品則除了王淑津所指出之1640年代*Hatcher Shipwreck* ㉑ 或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 ㉒ 之外，亦見於1620年代的*Wanli Shipwreck*（圖84）。㉓

淇武蘭遺址的德化窯白瓷無疑是以第40號墓（圖85，M040C002）㉔ 和探坑（圖86，P24501C002）㉕ 出土的長頸瓶最引人注目。兩件瓶器形保存良好，以M40出土例而言，是於略外敞的淺盤口下置粗長頸，長頸中部微內斂，以下弧度外揚，頸下接聳肩半球形器身，下腹部內收較劇，至近底器則又外敞，頸身貼飾模印鋪首啣環，但啣環已脫落僅存黏貼痕跡，器身下腹近足處飾凸棱一周。如果比較另一件探坑所出同類瓶，兩者除了一於頸間飾鋪首，另一係於相同部位貼飾板狀花式耳，其餘外觀特徵基本一致。

有關此類白瓷瓶的紀年資料以往有不少公諸於世，如原大衛德基金會藏釉下鐵書「崇禎己卯」（1639）（圖87）、㉖ 上海博物館釉下青花書「天啟四年」（1624）、㉗ 中國私人藏「萬曆甲午」（1594），㉘ 近年陳建中等著《德化窯》則收錄了「正德己卯」（1519）、「萬曆丁巳」（1617）（圖88、89）以及南明隆武元年（1645）等紀年墓出土作品。㉙ 主持淇武蘭遺址考古工作的

㉑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Phaidon: Christie's Oxford, 1988), p. 31, pl. 18.

㉒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es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p. 61. 王淑津文見：〈白瓷蓋盒〉，《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上）正文篇（2004），頁27-29，後收入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33-35。

㉓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p. 249, no. 7397.

㉔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8、頁194，圖版394。線描圖參見頁99，圖26瓶1。出土情況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202-207，圖版M040-5、M040-7。

㉕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8、頁195，圖版395。線描圖參見頁99，圖26瓶2。

㉖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pl. 6-c.

㉗ 陸明華，〈晚明福建瓷器窯業的發展〉，《南方文物》，2010年1期，頁108，圖6。

㉘ 葉文程等，《德化窯瓷鑑定與鑑賞》（南昌市：江西美術出版社，2001），頁49，圖18。

㉙ 陳建中等，《中國古陶瓷標本—福建德化窯》（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71，圖90-92，頁72，圖94、95，頁73，圖96-99。

臺灣本島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有貝[130] 或參與該遺址發掘的邱鴻霖[131] 和謝艾倫[132] 即是引用了上述部分紀年作品做為淇武蘭遺址此類白瓷瓶年代的定年依據。本文在此想進一步補充的是，上述淇武蘭遺址所見兩件德化白瓷瓶雖然分別出土於不同地點，但從前引正德己卯、萬曆丁巳等紀年墓出土作品得知，各墓均係以一件頸間飾鋪首和另一件頸間設板狀花式耳者，兩件成組地入墓陪葬。因此，淇武蘭遺址的上述兩件器形一致但於頸間分別貼飾鋪首和板狀耳的作品，極有可能原是成組的器物。其次，參酌前引紀年實例，我認為淇武蘭遺址白瓷瓶的外觀特徵顯示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七世紀前期，即萬曆丁巳（1617）至崇禎己卯（1639）之間。另外，由於貼飾鋪首瓷瓶乃是出土於墓葬（M40），故而同墓所伴出一件青花弦紋碗的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後者可再次檢證本文之前對於該類青花碗的年代判斷大體無誤。

（三）青釉

遺址出土的青釉標本以碗類居多，其中敞口碗外壁施釉不到底，內底無釉或留有疊燒澀圈，施罩透明度高的青灰色釉，多數標本製作不甚講究。個別標本器外壁有明顯轆轤拉坯痕跡，圈足徑較大，足著地處整修出寬幅不規整的窄圈足（圖90，P26004C004），類似的標本可參見漳州地區華安窯等窯址出土標本（圖91）。[133] 直口碗數量相對較少，以墓葬（M081）出土品（圖92，M081C001）[134] 為例，呈廣口淺身造型，除圈足部位之外整體施罩略失透的灰綠

[13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出土近代瓷器簡介〉，《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中心，2003），頁12。

[131] 邱鴻霖，《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出土墓葬研究—埋葬行為與文化變遷的觀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93。

[132] 謝艾倫，《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46。

[133] 吳其生等，前引《華安窯》，頁35。

[13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0、頁196，圖版404-405。線描圖參見頁101，圖27深腹碗。墓葬出土脈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92-99、圖版M081-8。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色釉，釉層較厚帶開片，屬於福建地區的所謂倣龍泉器，漳州南靖窯雖見類似器式的倣龍泉平口碗，[135] 但淇武蘭遺址標本的確實產地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至於這類直口淺腹青瓷碗的年代可從同墓出土的琉璃管珠亦見於淇武蘭遺址第74號墓，[136] 而後者因伴出了安平壺殘器，可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此外，1600年沉沒的*San Diego Shipwreck*亦見同類青瓷碗（圖93）。[137]

遺址出土的青瓷還見一類小口豐肩罐，造型呈小口卷沿，斜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至近底處外撇，底削出寬圈足，器表施青綠透明開片釉，內壁除近口沿處之外無釉，露胎處可見明顯的輪轆整修痕跡（圖94，P22203C005、[138] 圖95，P01901C018）。從胎釉特徵的觀察比較得知，淇武蘭遺址的青瓷標本當中有部份是屬於此類青瓷罐的殘片。值得一提的是，淇武蘭遺址第85號墓（M085）亦見同類罐的口肩部位殘片（圖96，M085C001），[139] 這就提供我們釐定該類青瓷罐年代的重要線索。也就是說，儘管M85並無紀年器物，不過由於同墓伴出的瑪瑙珠、琉璃珠和大小金屬環，既和出土有漳州窯青花玉壺春瓶的墓葬（M020）、或伴出安平壺的墓葬（M044、M045）以及前述出土德化白瓷長頸瓶及漳州青花弦紋碗的第40號墓（M040）的瑪瑙、琉璃或金屬環等飾件一致，[140] 據此可知M85出土的青瓷小口罐的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有趣的是，日本橫河民輔舊藏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一件年代標定於十七世紀的青瓷罐（圖97）之器式特徵和淇武蘭遺址標本如出一轍，[141] 顯然是來自同一瓷窯系所生產。從上述經由淇武蘭遺址墓葬伴隨遺物之比較所推定出的此類青瓷罐的相對年代竟然和東博研究人員於數十年前所訂定的年代不謀而合，不由得地讓人對日方的卓越鑑識眼力肅然起敬。

---

[135] 吳其生等，《南靖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41。

[136]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65。

[137]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p. 354-355.

[13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圖408-409。線描圖參見頁100-101，圖27瓶。

[13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108-113，圖版M085-7。

[14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22-123（M020）、頁207（M040）、頁221（M044）、頁227（M045）等參見。

[141]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 II》，頁137，圖5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黑褐釉等鐵釉系

1.廣口四繫罐

淇武蘭遺址的鐵釉系廣口四繫罐有多種樣式，僅就報告書所分類的「罐1」器式特徵而言，就有以下四種不同的細部特徵，即：Ⅰ式，於器肩置四橫繫（圖98，P12002C023），Ⅱ式，器肩一周陰刻弦紋，上置四橫繫（圖99，P07510010），[142] Ⅲ式，肩部四橫繫周邊或下方飾陰刻複線弦紋及波紋（圖100，P07410C031、[143] 圖101，P06604C018），Ⅳ式，橫繫下方貼捺押堆紋（圖102，P127SCC005）。[144] 以上出土例器表均施罩淡黃或淡褐色釉不到底，而若比對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沉船資料，可知四繫罐的時代均約在十七世紀初期。例如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見有Ⅱ式罐；[145] 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罐見有Ⅱ式、Ⅲ式（圖103）或Ⅳ式罐；[146] 十七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亦見Ⅱ式和Ⅳ式罐（圖104）。[147] 另外，遺址所見一件唇口下置粗長頸的溜肩罐，頸肩設四縱繫，下方陰刻複線弦紋（圖105，P08605C026），[148] 從外觀器式特徵推測其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

2.唇口四繫罐

Ⅰ類。小口、斜弧肩，肩以下內收成小底的黑褐釉四繫罐，是臺灣民間屢見的傳世古物。除了1970年代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所介紹用來醃製醬菜的「土罐」之外，[149] 臺灣海峽亦曾打撈出此類製品（圖106）。[150] 這類口徑和底徑相近且於唇口抹釉露出澀胎以利摞疊燒造的黑褐釉四繫罐於淇武蘭遺址亦有出

---

[14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200，圖版424。
[14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3。
[14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2。
[145]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7, no. 2143.
[146] C. L.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p. 229, no. 12131; p. 230, no. 12156; p. 242, no. oks 1977/108.
[147]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49, no. 380-383.
[14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200，圖版426。
[149] 劉文山，《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頁56圖6。
[150] 簡榮聰，《臺灣海撈文物》（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圖107，P05205C045），[151] 有的還於肩部繫耳之間押印「左香」陽紋字銘（圖108，P20502C036），[152] 類似的黑褐釉四繫罐於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或*Binh Thuan Shipwreck*、*Wanli Shipwreck*等十七世紀沉船均有發現。另外，日本長崎興善町遺跡、金屋町遺跡或大阪堺市（圖109），[153] 甚至關東地區東京新宿荒木町遺跡亦見同類黑褐釉四繫罐（圖110），[154] 其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Ⅱ類。遺址出土的此式四繫罐的數量約十餘件。其造型呈唇口，短直頸，折肩，最大徑在肩腹之間，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或平底微內凹。緊貼頸肩處對稱飾四只橫繫，從罐肩部位黏著的帶狀白色泥點可知，作品曾摞疊其他製品一起入窯燒造（圖111，P06505C021），[155] 類似器形的四繫罐曾見於日本愛媛縣湯築城跡，後者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之後（圖112）。[156] 另外，前引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157] 或*Witte Leeuw Shipwreck*（圖113）[158] 等十七世紀沉船亦見類似標本。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臺灣北部基隆出土（現歸臺灣國立博物館）的帶繫罐亦呈類似造型（編號AH1577），不同之處在於其頸肩處置三橫繫。[159] 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原總督府博物館藏另一件器肩留下摞疊入窯燒造時所造成圈狀支燒痕的褐釉四繫罐，肩上設四只縱繫，且於繫耳面以捺印的手法做出三股凸棱（圖114），[160] 其整體外觀特徵和淇武蘭出土標本完全一致（圖

---

[15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107、頁200，圖版427。

[15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107、頁201，圖版431。

[153] 堺市博物館，《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1993），頁41，圖F26。

[154] 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荒木町遺跡Ⅱ—宗教法人解脫會本部新築工事に伴う緊急發掘調查報告書—》（東京：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1998），卷頭圖版4之右上。

[155]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5，圖版450。

[156] 柴田圭子，〈愛媛縣における產地不明の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23期（2003），頁46圖中，B Type。

[157] Jean-Paul Desruches, *Treasures of the Saga of the San Diego*, p. 249. 圖版參見Jesus T. Peralta, Ramon N. Villegas ed., *Saga of the San Diego*, p. 84, no. 23.

[158] 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 pp. 237-238.

[159] 謝明良，〈鐵釉系標本〉，《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陶瓷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上），正文篇，頁50，圖15，收入前引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頁52，圖59。

[160] 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頁54，圖68，編號AH39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5，P21108082）。

3.五繫罐

淇武蘭遺址的黑褐釉五繫罐是於唇口短頸罐罐肩近頸處等距置四橫繫及一縱繫，短頸上斂下敞（圖116，P05205C046），[161] 有的還於橫繫之間押印長方形印記（圖117，P21910C015）。中國廣東省四會明代墓葬曾經出土類似器身造型的無頸五繫罐（圖118），[162] 而傳說是豐臣秀吉（1537－1598）側室賜與伊達正宗（1567－1636）的日本私人藏品造型則和淇武蘭遺址標本器式一致，前者亦如淇武蘭標本般於肩部縱繫對側鈐印帶框，為「清香」字銘（圖119）。[163] 從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圖120）[164] 或相對年代約於1697年的葡萄牙人於東非的主要據點肯亞耶穌堡（Fort Jesus）打撈上岸的葡籍*Mombasa Shipwreck*均見此類黑褐釉五繫罐，[165] 可知上述淇武蘭遺址以及相傳伊達正宗舊藏的同式罐的年代亦約於十六至十七世紀。另外，過去於西沙群島打撈上岸的一件僅存口肩部位之被中國學者定年為唐代的同式五繫罐（圖121），[166] 其定年顯然有誤，應予修正。

4.玉壺春瓶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表施黑釉或褐釉造型呈細弧頸、溜肩以下置圓鼓腹的俗稱玉壺春瓶，以墓葬編號47和88的標本最具代表性。兩墓作品口部均佚，但器身造型大體一致，施釉不到底，其中一件施罩黑釉，底置圈足（圖122，

---

[16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6，圖版454。

[162] 楊豪等，〈廣東四會發現三座明墓〉，《考古》，1994年2期，頁189，圖2之1。

[163] 德川義宣，《茶壺》（京都：淡交社，1982），圖151及頁224-225的解說。詳參見：謝明良，〈關於「清香」壺—從臺灣發現例談起〉，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237-249。

[164]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1993), p. 85, pl. 25. Jean-Paul Desroch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9.

[165] Robin C. M. Piercy,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Report no. 3,"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6-4 (1977), p. 335, fig. 4.

[166]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047001），[167] 另一件表施淡褐釉，底置餅形實足（圖123，M88C002），[168] 後者外底與前述同為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足外壁施加變形蕉葉的褐釉瓶（圖124，P04104C024）[169] 之外底有相近之處。儘管兩座墓葬未伴出可判明相對年代的其他施釉陶瓷，不過從其出土的玉壺春瓶造型均和前述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青花玉壺春瓶大致相同一事可知，其相對年代亦約於這一時期。其次，就墓葬伴出的玻璃管珠等而言，由於出土有褐釉玉壺春瓶的墓88管珠與墓4、墓30等兩座伴出青花玉壺春瓶的玻璃管珠完全一致，[170] 此亦可間接窺知黑褐釉玉壺春瓶的年代應相當於青花玉壺春瓶。從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1572－1620年在位）定陵出土的金製玉壺春瓶底部鏨刻「金壺瓶」銘文，可知俗稱的「玉壺春瓶」在明代是稱為「壺瓶」，其主要用途是盛酒。[171] 所以，如果淇武蘭的原住民未曾變更此類中國瓶式的原有用途，則陪葬有陶瓷玉壺春瓶或安平壺一事就有可能只是表明其以酒入墓的葬俗，這也就是說原住居民們在意的應是做為內容物的酒，而非做為外容器的陶瓷。

5.龍紋罐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以龍紋做為主紋飾的罐類標本數量不少，從可復原出大體器形的標本可知，所謂龍紋罐的造型和龍紋的裝飾表現技法其實頗為多樣，本文僅就龍紋的外觀和裝飾布局等特徵，擇例分類介紹如下。

Ⅰ式，唇口、短頸，頸肩置縱繫，繫耳間陰刻菊形花，肩和下腹部位飾波狀捺紋一周，肩腹捺紋之間貼飾奔騰於浪頭上的雲龍，器表施罩褐釉（圖125，P09104C015），[172] 類似的龍紋罐見於東南亞菲律賓等地收藏（圖126），後者被視為十六世紀廣東瓷窯製品。[173]

[167]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4、416。墓葬出土脈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232-237，圖版M047-8。

[16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5、417。墓葬出土脈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18-123，圖版M088-9。

[16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17、頁226，圖版567。

[17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63，圖M004-6，頁165，圖M030-11。

[171]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33-51。

[17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7，圖版456。

[173]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Jar Collectors, 1992), p. 126, no. 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I式，唇口，其顯著的特徵是以卷起的龍身為繫耳，其與堆貼刻劃於罐身的龍首或龍尾等其他部位共同構成完整的龍體，表施褐釉（圖127，P166SCC048）。[174] 類似的龍紋罐見於菲律賓等地收藏（圖128），關於其年代以往雖有元代或十六世紀等不同定年，[175] 但從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打撈出此式龍紋罐（圖129），[176] 以及日本愛媛縣舊等妙寺跡出土例可知，[177] 其相對年代應在十六世紀後期。

III式，器形特徵略同II式，但頸肩置獸面縱繫，施褐釉（圖130，P26404C010），類似的龍紋罐見於東南亞多處收藏（圖131）。[178] 前述*San Diego Shipwreck*以及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期的中國廣東汕頭南澳一號沉船亦見類似的龍紋罐，不同的只是沉船此式龍紋罐之繫耳無獸面。[179] 其中*San Diego Shipwreck*罐高僅31公分。

IV式，平口，以下用弦紋做出三段式頸，肩置六只縱繫，薄胎，表施黃褐釉（圖132，P24602C095），類似的龍紋罐見於菲律賓（圖133），後者被認為是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南方製品，[180] 或十七世紀越南所產。[181] 從胎釉特徵判斷我傾向其為中國製品的看法。

V式，僅存肩腹部位，薄胎，胎色灰白，係於器肩刻劃出以弦紋為邊線的勾形卷草紋裝飾帶，裝飾帶和下腹部凸弦紋之間飾雙龍搶珠，表施淡褐色釉

---

[17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7，圖版457。

[175] 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Rutland: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p. 195, pl. 218; p. 196, no. 220.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24, no. 59.

[176]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2.

[177] 柴田圭子，〈愛媛縣における産地不明の貿易陶磁〉，頁46，圖1-C。

[178]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18, no. 46-47.

[179]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1; 典藏編輯部，〈晚明沉船 南澳一號〉，《典藏》，6（2010），頁208。

[180]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33, no. 76.

[181] 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l. 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4，P25607C171），婆羅洲Sabah Museum收藏有類似裝飾的龍紋罐（圖135），Barbara Harrisson認為後者年代約於十七世紀。[182]

從*San Diego Shipwreck*等具有相對年代沉船打撈出與Ⅰ~Ⅲ式龍紋罐相似的製品，可知Ⅰ~Ⅲ三式標本的相對年代均約於十六世紀中後期，最遲不晚於十七世紀初。相對的，Ⅳ式、Ⅴ式薄胎龍紋罐的確實年代仍有待實證。儘管以往傾向將裝飾有龍紋的大型罐納入廣義的所謂Martaban Jar的脈絡予以考察並推測其產地在中國廣東地區，但此僅止於推測，未能實證。應予一提的是，《明史》（卷三百二十三）載「文郎馬神」（今婆羅洲南部印尼加里曼丹首都馬辰Banjarmasin）：「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瓷甕，畫龍其外，死則貯甕中以葬」。由於婆羅洲馬來西亞沙勞越（Sarawak）等地確實出土不少龍紋罐，[183] 看來部份尺寸較大的龍紋罐有可能被當地土著做為葬罐來使用。

另一方面，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鐵釉系帶繫大罐當中還包括部分罐式與龍紋罐相近，但並無龍紋裝飾的標本，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罐頸肩部位所置帶菊形釘釦的縱式繫（圖136，P25904C126）。類似帶菊花形釘釦的褐釉帶繫罐殘片曾見於臺灣多處十七世紀遺址，如北部淡水紅毛城遺址[184] 或東部花蓮崇德遺址都有出土，[185] 類似繫耳但罐身陰刻鳳鳥的褐釉罐頻出土於東南亞（圖137）。[186]

淇武蘭遺址另出土一件口頸部略同Ⅰ式龍紋罐而器身陰刻人物的標本（圖138，P25507C082），人物身著長袍，頭戴冠帽。Sabah Musuem收藏的一件相對年代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褐釉六繫罐，罐身亦陰刻多位戴官帽著官服並有手持摺扇的舞台雜劇般人物（圖139）。[187] 另外，東南亞私人藏品當中還可見到於帶

---

[182] 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pl. 73.

[183] Eine Moore, "A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Stonewares of Martabani Type,"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 XVIII (1970), pl. 6-9.

[184] 陳有貝，《淡水紅毛城邊坡下陷考古試掘計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07），圖版12右上。

[185] 劉益昌等，〈花蓮崇德遺址的研究史：議題回顧與展望〉，收入《環臺灣地區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暨2007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08），頁1-27。另外，出土標本參考圖片是由該文作者所提供。

[186] 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pl. 9b.

[187] 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pl. 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繫褐釉罐罐身貼人物，人物旁刻劃一屋角起翹的攢尖式頂屋宇，門戶正中刻「龍亭庫」榜題（圖140），[188] 似乎意謂著死靈居所，而罐身人物則是和引魂儀式有關的場景？就此而言，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一片陰刻「之表德」文字的褐釉罐殘片（圖141，P25805C021），也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可能和歌頌死者生前行儀的文句有關？當然，此均止於臆測。不過，應予一提的是，二十世紀初Fay-cooper Cole於呂宋島北部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時，在島上洞窟發現伴隨人骨的罎罐當中即包括了龍紋罐；Berthold Laufer也提到此類龍紋罐在菲律賓等東印度諸島被土著民視為寶貨，其既可為嫁妝，貯存壺中的水甚至有療傷癒病的功能。[189]

6.其他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黑褐釉標本當中還包括幾件器形大致保留完整，但於成形技法或裝飾方面相對少見的標本，例如一件表施黑褐釉的短直頸折肩罐，一見之下罐肩下方器身最上部位似有變形蓮瓣刻飾，但從罐內壁的接痕可知環繞器身的變形蓮瓣紋，其實是陶工將胎接成形時的接著部位切割成蓮瓣形，致使外觀的蓮瓣有著浮雕般的立體感，可謂匠心獨運（圖142，P21601C037）。[190] 類似的罎罐較為少見，但近年中國江蘇省徐州富庶街明代房址（WT3）出土有類似作品（圖143），[191] 參酌一件帶萬曆二十一年（1593）紀年的德化窯白瓷長頸双耳瓶瓶肩部位亦見類似的變形蓮瓣浮雕刻飾，[192] 可以想見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蓮瓣飾黑褐釉罐的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期。另外，淇武蘭遺址還出土一件僅餘底足的瓶殘件（同圖124），實足呈喇叭式，其上環飾仰式變形蕉葉，胎質堅緻，齊平的外底心有轆轤整修痕跡，是十七世紀陶瓷常見的底足樣式。

---

[188] S. Adhyatman & Abu Ridho, *Martavans in Indonesia*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4), p. 94, pl. 19.

[189] Fay-cooper Cole with postscript by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p. 8, pl. Ⅱ,Ⅲ, Ⅴ.

[190]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10、頁210，圖版473。

[191] 徐州博物館（盛儲彬等），〈徐州富庶街明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004年3期，圖版13之5。

[192]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p. 49; pl. 6-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鉛釉陶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此一時期的鉛釉陶器形包括軍持（Kendi）、蓋盒以及瓶壺類器身殘片（圖144，P22903C007）。[193] 其中，一件僅存注口及器身少許部位的鉛綠釉軍持殘件（圖145，M075C001），[194] 可能是由於器形特殊加以注口保存良好，以往曾經多次報導，王淑津並且指出其和臺灣外島澎湖風櫃尾蛇頭山荷蘭人所建造城堡遺址所採集同類綠釉軍持殘片均來自中國南方瓷窯所生產。[195] 本文在此想予以補充的是，儘管日本不少遺跡均見軍持標本，但其分別屬中國景德鎮、日本肥前青花瓷和東南亞素燒或絞胎器，施罩鉛綠釉的中國南方軍持標本目前似乎僅見於長崎萬才町遺跡，[196] 後者之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末至1630年代之間。考古出土標本之外，日本九州鹿兒島縣薩摩半島則見同類三彩軍持傳世實例，其器身以複線凸棱為界，身腹呈瓜形，斜弧器肩模印陽紋花卉，其上則為板形口沿細長頸，肩腹之間置與淇武蘭遺指標本造型相近的帶凸棱乳房形注口（圖146）。[197] 應予一提的是，上引傳世三彩軍持整體雖施罩鉛綠釉，但器肩印花花葉部位則分別塗飾黃釉和紫釉，據此不排除臺灣淇武蘭和風櫃尾遺址的綠釉軍持之業已佚失的肩部原亦屬帶印花且施加有其他色釉以為裝飾？換言之，其原亦施罩三彩釉。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軍持其實不只一件，於細長頸上設壁形口沿，造型似所謂紙槌瓶口頸部位的標本即為珍貴的一例，其表施褐釉，壁形口沿模印纏枝花卉（圖147，P26504C006），[198] 有趣的是其花卉紋樣和前述薩摩半島傳世的三彩

---

[19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3。

[19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4-585。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71，圖M075-8。

[195] 王淑津等，〈十六至十七世紀鉛釉陶瓷初探—以臺灣考古遺址出土品為例〉，《故宮文物月刊》，2007年1期，頁100-103。

[196] 大橋康二，〈築町遺跡出土の陶磁器につい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頁72-73。

[197] 上東克彥，〈鹿兒島縣薩摩半島に傳世された華南三彩—クシデイと果實形水注—〉，《貿易陶磁研究》，24（2004），頁173，圖2及頁176，圖1。

[19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30，圖版586-5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持口沿印花幾乎完全一致（同圖146c），可以確認應屬中國南方鉛釉軍持的口頸部位殘件。不僅如此，上述兩件分別見於淇武蘭遺址和薩摩半島的軍持壁形口沿印花甚至有可能是相同作坊使用同批模具壓印而成的。從福建省漳州平和窯址出土有被當地學者定名為「墨台」，但實為此式軍持口頸部位之素燒殘件看來（圖148），[199] 淇武蘭遺址鉛釉軍持極可能來自漳州窯。結合傳世整器的外觀特徵，我認為此式軍持的相對年代應在十六世紀後期。

淇武蘭遺址的鉛釉蓋盒分二式，其中一式外表施罩綠釉的母蓋盒盒面以複線弦紋為界，上施陽紋印花，下飾菊瓣式棱（圖149，P12702C052、P12303C061），[200] 造型裝飾構思與前述德化窯白瓷盒（同圖81）有共通之處。類似器式的中國南方鉛釉盒頻見於各地公私收藏，除盒身及蓋下沿菊瓣施綠釉之外，常見另於盒面各式印花紋樣部位另塗施黃、紫等釉彩（圖150），[201] 甚至於盒面飾開光，並在開光內別施彩釉。裝飾多樣，不一而足，而單色釉作品相對少見。看來僅存綠釉盒蓋蓋沿部位的淇武蘭遺址出土標本已佚失之盖面，極有可能亦塗施有其他彩釉。前引越南海域發現的*Binh Thuan Shipwreck*可見此類鉛釉蓋盒，後者之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前期。[202] 相對於上述蓋盒盒身設子口，淇武蘭遺址的另一式盒則是於蓋設子口（圖151，P07210C018），[203] 其蓋身雖已不存，但從蓋的尺寸以及弧頂平沿的造型特徵推測其應屬蓋盂式盒，中國福建省平和田坑窯曾出土類似的盂式蓋盒（圖152），只是該盒蓋與盒身是否確係一組？仍有待查證。[204] 另外，相對於東南亞有將蓋盒做為嚼食檳榔的容器，日本則往往將此類鉛釉蓋盒轉用成茶道的周邊道具，由茶具商人於安政二年（1855）模倣相撲番付彙整而成的《形物香合相撲番付》所見稱作「交趾」的蓋盒其大

[199] 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京都：茶道資料館，1998），頁118，圖99。此承蒙王淑津小姐的教示，謹誌謝意。

[20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2。

[201] 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及尾崎直人編，《インドネシア スラウエシ島に渡った三彩交趾燒展》（富山市：富山佐藤美術館，2001），所收諸多三彩盒參見。

[202]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8, fig. 59.

[20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1。

[204] 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頁104，圖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即來自中國南方地區，也就是今日俗稱的「華南三彩」。[205]

事實上，淇武蘭遺址也出土了多彩鉛釉陶，此即（P26004C134）出土的施加黃釉和綠釉的陶片，其器表可見一道水平凸線圈，以下陰刻覆式蓮瓣形外廓，再於蓮瓣陰刻處塗黃釉，餘施綠釉。內裏側無釉，露胎處呈土黃色調，從內壁所見水平突起的胎接痕跡可知器表的凸線圈應是胎接成形時所留下的接痕（圖153，P26004C134）。除了日本九州熊本縣濱乃館遺跡出土相同釉彩和刻劃花裝飾的玉壺春瓶（圖154），[206] 沖繩首里城木曳門、廣福門地區也出土了陰刻蓮瓣的三彩注壺殘片（圖155），[207] 由於淇武蘭遺址標本蓮瓣上方凸線圈以上明顯內折，因此原器式似乎較接近注壺類殘片。無論如何，早在1980年代，龜井明德已指出濱乃館出土的此類三彩刻花玉壺春瓶瓶身之劃花紋樣與所謂Tradescant Jar有著淵源發展的關係，其年代約於十六世紀。[208] 從目前的考古出土實例看來，Tradescant Jar一名雖源自牛津大學Ashmolean Museum收藏的一件1627年歿John Tradescant原擁有的中國南方鉛釉帶繫罐，但這類可以華南三彩予以概括之帶繫罐的年代均集中於十六世紀，此一年代亦即淇武蘭遺址三彩刻花標本的相對年代。[209]

---

[205] 尾崎直人，〈インドネシア スラウエシ島に渡った交趾燒合子—本多弘氏所藏品による〉，前引《インドネシア スラウエシ島に渡った三彩交趾燒展》，頁105-111。

[206] 大分市歷史資料館，《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南蠻の貿易陶磁器—》（大分市：大分市歷史資料館，2003），頁18，圖46。

[207] 圖轉引自：大分市歷史資料館，前引《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南蠻の貿易陶磁器—》，頁14，圖34。另外，原發掘報告可參見：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首里城跡　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發掘調查報告書〉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3集（沖繩：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208] 龜井明德，前引《九州の中國陶磁》，頁78-79。及同氏〈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補遺〉，收入《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345及頁359-362。另外，原發掘報告參見：桑原憲章等，《濱乃館—阿蘇大宮司居館跡》熊本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21（熊本：熊本縣教育委員會，1977）。

[209] 木村幾多郎，〈いわゆる「トラディスカント壺」について〉，收入前引《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頁81-8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五、東南亞陶瓷

（一）泰國陶瓷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泰國施釉陶瓷標本計二件，均屬泰國中部Singburi縣Bang Rachang郡Ayutthaya（大城）北西Mae Nam Noi，即Noi河窯系所生產的帶繫罐（圖156）。[210] 向井互曾對該窯系帶繫罐進行了型式分類，淇武蘭遺址出土的標本當中有一件屬向井互所謂無頸四繫罐的口、肩部位殘片（圖157，P26005C060），[211] 其係於渾圓的唇口下方飾複線弦紋及泥條弧形橫繫，類似的Noi河窯系四繫罐於臺灣亦曾出土。如1622年荷蘭人於澎湖西南端風櫃尾所構築之城堡遺跡，以及大體竣工於1632年臺灣本島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遺跡即見此類標本。我曾於數年前粗略地梳理了數艘可大致判明其相對年代的沉船及部分陸地考古遺跡所出同類標本，以做為臺灣出土該類泰國陶瓷的定年參考。[212] 其中，陸地遺址如日本九州大分市大友城下町因天正十四年（1586）島津入侵所導致火災的遺留，[213] 或大阪府堺環壕都市慶長二十年（1615）燒土層均出土了同類四繫罐標本，[214] 可知其年代跨幅約於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

至於沉船遺留，除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1609年*Mauritius Shipwreck*、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1656年*Vergulde Drack Shipwreck*或1600年西班牙*San Diego Shipwreck*等沉船之外，泰國*Ko Kradai Shipwreck*、*Ko Si Chang I Shipwreck*

---

[210] Caaruk Wiraikeow，〈タイ國シンブリー縣ノイ窯跡群發掘調查報告書〉，《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X（2002），頁200。

[211] 向井互，〈タイ黑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23（2003），頁102。

[212] 謝明良，〈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2007），後修訂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263-283。

[213] 吉田寬，〈豐後府內における天正十四年（1586）一據資料について—中世大友府內町跡第3次調查SX210の評價と檢討〉，《貿易陶磁研究》，26（2006），頁129，圖3-63。

[214]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9（1999），頁125，圖2之5、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及馬來西亞*Wanli Shipwreck*等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期沉船亦見此類無頸四繫罐。[215]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Noi河窯系無頸四繫罐始見於十六世紀中期，除了馬來西亞柔佛州（Johor）發現的沉沒於1727年之荷蘭東印度公司*Risdam Shipwreck*一例之外，[216] 集中見於十六世紀中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遺跡。由於Singburi地區有複數窯場燒製此類四繫罐，[217] 而經發掘的Bang Rachang二號窯甚至同時燒造數類造型不一的四繫罐，[218] 因此有關該類四繫罐的型式編年仍然不易進行。不過，若就淇武蘭遺址標本的外觀特徵而言，因其與1613年荷蘭*Witte Leeuw Shipwreck*（圖158）[219] 以及1620年代構築的澎湖風櫃尾採集標本較為近似，推測其相對年代可能亦約於十七世紀初期。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另一件泰國Singburi地區施釉陶瓷是見於遺址現象166的大型帶頸四繫罐（圖159，P05205C136），[220] 罐口沿外卷、束頸、弧肩、肩以下微弧內縮成大平底，頸肩部位置四只半環形橫繫並施罩偏黃的橄欖色釉，胎釉燒結良好，通高58.8公分。其整體造型與泰國海域十六世紀前半*Klang Aow Shipwreck*或菲律賓海域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所出同類製品造型相對近似，施釉特徵及碩大的尺寸則和日本沖繩縣久米島墓葬出土之做為骨甕的Noi河四繫罐有類似之處（圖160）。[221] 其實，泰國Noi河窯系燒製的此類帶頸四繫罐曾出土於香港大嶼山竹篙灣一處，據推測是明代進出廣東和東南亞商船的中途補給

---

[215] 謝明良，前引〈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頁264-269；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s*, p. 258, no. 2637.

[216] Jeremy Green, "The Survey of the VOC Fluit Risdam (1727), Malay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5-2 (1986), pp. 93-104; Roxanna M. Brown and Sten Sjostr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 2001), p. 61, fig. 48.

[217] 謝明良，前引〈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頁264，圖2。

[218] Caaruk Wiraikeow，同前引〈タイ國シンブリー縣ノイ窯跡群發掘調查報告書〉，頁220第2型和頁201第3型。

[219] C. L.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p. 239, no. 12211，左下圖。

[22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8，圖版461。

[221] 謝明良，前引〈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頁270-271，及向井亙，〈タイの陶磁史（8）—日本出土のタイ陶磁器（2）〉，《陶說》，684（2010.3），頁55，圖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站；㉒ 日本時代任職台灣總督府的瀨川孝吉（1906－1998）於1920－1930年代拍攝於排灣族內文社（Chakobokoji社）的相片中亦見類似的泰國陶瓷（圖161），㉓ 後者似乎是被做為頭目的傳家寶物。參酌上引沉船或日本陸地考古遺跡出土的同類製品可以推測淇武蘭遺址的這件大型帶繫罐的年代有較大可能在十六世紀後期，至遲不晚於十七世紀初。另外，除了骨甕、傳世寶物等消費地的用途變更例之外，學界對於泰國輸出四繫罐之原先功能亦有涉及，即從文獻記載結合出土案例，計有內貯椰子油、漆、砂糖、胡椒、硫磺和香花酒等諸多說法，可惜均難實證。㉔ 就常理而言，以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為交易中心的土產物資種類多樣，而Noi窯系燒造的無頸或有頸四繫罐的尺寸大小亦不盡相同，應該不會限於裝貯單一物資，倒是幾可確認的是此類泰國壺甕應是做為某種內容物的外容器而得以進入淇武蘭遺址所在的蘭陽平原噶瑪蘭人居地。

（二）緬甸陶瓷

遺址所見疑似緬甸陶瓷僅存殘片，標本除了兩側斷裂處之外整體施罩黑釉，釉帶木光滿佈細開片，外觀略呈平板狀，惟施釉的兩端些微上揚，胎呈淺棗紅色調羼有白色結晶等雜質，其胎釉特徵與緬甸瓷窯燒製的黑釉器大體一致，結合標本的外觀特徵看來，其極可能是所謂Martaban Jar大型壺甕的繫耳

㉒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招紹璿等），〈香港澳門五十年來的考古收穫〉，《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516-517引Weacham, "W. A Wing Trading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r," *JHKAS*, vol. XII (1990), pp. 100-115及1992年古物古蹟辦事處資料；感謝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孫德榮先生慨允筆者特別參觀並拍攝標本。另外，大嶼山該遺址一說是葡萄牙人首次赴中國的屯門（Tamao）。此參見：林梅村，〈大航海時代東西方文明的衝突與交流—15~16世紀景德鎮青花瓷外銷調查之一〉，《文物》，2010年3期，頁89引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23。

㉓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瀨川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3），頁74，左上圖。

㉔ 向井亙，〈タイの陶磁史（7）—日本出土のタイ陶磁器（1）〉，《陶說》，683（2010.2），頁50-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位殘片（圖162，P000SCC2965）。㉕

Martaban是緬甸勃固王朝（Pegu Dynasty，1287－1539）的貿易港市，因此Martaban Jar一名Pegu—Jar。㉖ 早在1330－1340年代伊本白圖塔（Ibn Battta（Beirut））的著名旅行記中已經提到凱魯凱爾的女王送給他四件內貯生薑、胡椒以及航海所需的鹽漬檸檬和芒果的Martaban Jar。㉗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Barbosa也提到Martaban港都「生產有許多巨大且牢固之一望即知極為優製的陶瓷壺」。㉘ 學界對於所謂Martaban Jar有廣義和狹義等兩種不同的理解，廣義是包括所有可能是經由Martaban港都轉運往世界各地之裝盛各種貿易物資的各類壺甕，狹義則是指稱一類經常裝飾有白泥連珠或條狀堆紋的推測是緬甸所燒製大型黑釉壺甕。雖然Martaban地區迄今並未發現相應的瓷窯遺跡，㉙ 但是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黑釉板形標本有可能即狹義Martaban Jar的繫耳部位殘片。

就現今的考古資料看來，除了前述1613年荷蘭籍*Witte Leeuw Shipwreck*或1600年西班牙籍*San Diego Shipwreck*等沉船之外，日本陸地遺跡如琉球首里遺跡、㉚ 博多（第60次）、㉛ 長崎市（長崎奉行所）㉜ 和大友氏府內町天正十四

㉕ 出土標本可能是Martaban Jar繫耳殘片的判斷曾得到泰國藝術大學博士生向井互學兄的教示，謹誌謝意。

㉖ 津田武德，〈ラオス ミャンマー陶磁概說〉，收入：《特別展—敢丁コレクション東アジア古陶磁展6》（富山市：富山佐藤美術館，1999），頁12-13。

㉗ 家島彥一譯注，《大旅行記》6（東京：平凡社，2001）東洋文庫691，頁414。

㉘ Duarte Barbosa,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an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Bbordering 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ir Inhabitant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8-1921), pp. 157-159. 此處引文是參照家島彥一日文譯注由我中譯而成，參見前引《大旅行記》，頁443。

㉙ 佐佐木達夫等，〈ミャンマー陶磁の發見〉，《貿易陶磁研究》，23（2003），頁110-111。

㉚ 沖繩縣立埋葬文化財センター，《首里城跡》，頁65，圖42之12及卷首圖版上。

㉛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博多遺跡群第60次發掘調查報告書》，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285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1991），圖版89-700；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收入：《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繩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鹿兒島：鹿兒島大學，2004），頁1-14。

㉜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前引《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 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頁66，圖7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1586）火災遺留（SX210）都出土了黑釉飾白泥連珠和堆線紋的Martaban Jar。[233] 現存的Martaban Jar的尺寸有高近一公尺者（圖163），亦見高僅三十、五十公分的中小型器，繫耳數亦不盡相同，有三繫、四繫和五繫，繫耳造型也有縱繫和橫繫之別。從外觀特徵推測淇武蘭遺址標本可能屬壺的繫耳部位殘片，帶縱繫的Martaban Jar出土例可參見前述日本大分府內町1586年火災遺物殘器。

結語

總結淇武蘭遺址出土外國陶瓷的年代，除了個別標本可能早自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前期，其絕大多數標本屬十六世紀中後期以降製品，產地主要來自福建省南部的漳州地區。文獻記載1575年（明朝萬曆三年）福建巡撫劉堯誨於海澄港（1567年分漳州府龍溪與漳浦兩縣部分轄地置海澄縣，改「月港」為海澄港）頒佈施行船引制度，正式將臺灣北部雞籠和淡水列為中國海商的貿易地點，而1590年代自海澄港赴雞籠、淡水的海舶也有十艘之多，看來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大量十六世紀後期福建陶瓷應和明代朝廷的上述海貿舉措有關。其實，早在鄭舜功《日本一鑑》已曾提及他1550年代赴日本時是取道雞籠；[234] 1589年（明朝萬曆十七年）福建巡撫周案建議赴東西兩洋的船隻八十八隻，「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可知其時已有中國漁船進入臺灣雞籠等地。[235] 另外，1560年代的文獻記錄了中國和琉球王國使節團經常在往返航海中經過北台灣沿岸，其船隻或停泊淡水一帶補給用水，或以雞籠山做為調整航向的標的，張彬村因此認為1575年中國頒行海貿稅制，規定海舶到

---

[233] 吉田寬，〈大分、府內から出土した東南アジア產陶磁〉，收入前引《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頁46，圖10；另參見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收入茶道資料館，《東南亞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2002），頁192-212。

[234] 詳參見：陳宗仁，〈雞籠、淡水的崛起〉，〈強權在福爾摩沙島相遇〉，收入於《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頁11-127。

[235]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原載《臺灣銀行季刊》，6卷1期，收入同氏《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1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雞籠、淡水的船引稅額固然是臺灣海貿地位崛起的指標，但實際上在1560年代初期臺灣已在東亞海域的貿易舞台嶄露頭角；日本德川幕府既於1615年明列臺灣的高砂國為朱印船海外貿易國之一，1617年張燮《東西洋考》仍然是將雞籠和淡水列為臺灣僅有的貿易地點，雖然其時海商已漸轉赴西南臺灣的大員（北港）進行貿易。[236] 我認為，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也應該在此一歷史脈絡中予以評估。

包括雞籠、淡水的北臺灣後來被西班牙人所佔領（1626－1642）並於雞籠設置據點；西南臺灣則於1624年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設立基地經營貿易，進一步確立了臺灣的海上貿易地位。依據1632年西班牙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撰寫的被中譯為〈關於艾爾摩莎島情況的報告〉，以西班牙人在雞籠建設的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為中心，將北臺灣原住民區分為兩區塊，即從雞籠到宜蘭、花蓮，以及從雞籠經北海岸到淡水河流域。其中，雞籠以東至宜蘭、花蓮的住民村社共43個，可區分成三組：a. 馬賽村社：Quimaurri與Caquiuancian，b. 噶瑪蘭村社，c. Turoboan（哆囉滿）及其以南13個村社。[237] 位於宜蘭平原的淇武蘭遺址即為噶瑪蘭人居地，推測應即文獻中的淇武蘭社。詹素娟曾經推測1640年代的宜蘭平原約有40個村落，其時的噶瑪蘭人約2,300戶，人口計約10,000人。[238] 噶瑪蘭人不僅有自己的語言且懂得凱達葛蘭族的巴賽語並擁有豐富的稻米，以致於富有語言能力、善於操舟擅長和西班牙人交易的馬賽人至噶瑪蘭以包括舶來品在內的物資交換米，而地產黃金的哆囉滿人也攜來黃金與噶瑪蘭人交換米、小魚、中國布和銅鐲等商品。[239]

---

[236] 張彬村，〈臺灣早期海貿地位的興起與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收入：《東亞海域與臺灣：慶祝曹永和院士九十壽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2010），頁2-4。

[237] 陳宗仁，〈西班牙人佔領前北臺灣水域社會的交易活動：兼論「馬賽」人的形成〉，《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2010），頁4。

[238]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43。

[239] 陳宗仁，〈西班牙人佔領前北臺灣水域社會的交易活動：兼論「馬賽」人的形成〉，頁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外國陶瓷而言，所見東南亞泰國和緬甸陶瓷甕罐類是1600年西班牙*San Diego Shipwreck*等多艘十六至十七世紀沉船常見的裝盛什物的容器，考慮到當時北臺灣的交易網絡，可以推測住居於淇武蘭的噶瑪蘭人有可能輾轉得自擅長和西班牙人交易的馬賽人之手。[240] 當然，亦不排除是直接獲自西班牙人，後者一個極端的案例是，當1632年3月一艘自雞籠航向馬尼拉的船因故漂流至宜蘭平原海岸，船上的數十名包括西班牙人、中國人、日本人等在內的船員，悉數遭到噶瑪蘭人殺害，[241] 不過被洗劫一空的舶載物資是否包括東南亞陶瓷甕罐？已無從檢證。

另一方面，儘管福建漳州窯製品是十六至十七世紀見於歐亞許多國家或地區之流通範圍極廣的中國外銷瓷，各國海商或多或少都曾參與漳州窯陶瓷的交易活動。問題是，淇武蘭遺址除見有大量的漳州窯貿易瓷，亦見黑釉蓮瓣紋罐等從未出現在中國以外消費地的製品（同圖143），此一陶瓷的組合情況，說明了淇武蘭遺址的中國陶瓷主要是得自中國的海商或漁民。特別是1575年福建巡撫在海澄頒布實施船引制度，正式把雞籠和淡水列入海商貿易地，既促使中國商人來台與日本等國海商貿易，對於中國漁民與臺灣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可能亦具推波助瀾的作用，此或致使包括噶瑪蘭人在內的臺灣原住民得以獲致一部分並非用來外銷的中國人日常用瓷，其中甚至包括福建地區居民經常用於宗教供儀或喪葬的德化窯白瓷長頸瓶，並有出土於墓葬的案例（同圖85，M040C002），此一現象似乎表明淇武蘭遺址的居民於葬俗方面已羼入若干漢人慣俗。

其實，自中國攜入臺灣的高溫施釉陶瓷於淇武蘭遺址墓葬中和噶瑪蘭人製作的低溫陶器彼此之間有著替代、互換的現象。比如說，一般置於頭部邊側的

---

[240] 關於馬賽人的商業活動詳參見：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45-80；康培德，〈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卷1期（2003），頁1-32。

[241] 中村孝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北文獻叢刊》，2（1956），頁21-36；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頁3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在地陶罐（如M33、M96），可置換成中國製青花瓶（如M20），或者以補足的方式將中國瓷瓶與在地陶罐共伴並列於死者頭部附近（如M88）。經由遺址出土的高溫施釉陶瓷還可觀察到幾點有助於復原淇武蘭原住民物質文化的線索。由於高溫施釉陶瓷僅見於遺址的上文化層，而若依據碳十四年代測定則經樹輪校正的該文化層之相對年代集中在距今600年到近代。其中，墓20和墓30的年代分別是BP. 420－291和BP. 512－302。㉔ 鑑於兩墓均出土了相對年代在1575－1625之間的高溫施釉玉壺春瓶，因此可將兩墓的年代限定在碳十四年代測定所採行的BP.（距1950年）375－325之間，亦即距今（2010年）435－385年。此一相對年代可為碳十四大跨幅的年代值進行必要的修正，同時再次提示碳十四測定法對於講究精確年代分析的歷史時期遺跡定年的侷限性，應將其定位為不得已時才能偶一為之的便捷定年參考手段。

如前所述，所謂「玉壺春瓶」其實是入清以來的稱謂，在中國明代之前稱為「壺瓶」，總之，其功能是貯酒的酒器。設若做為消費者的淇武蘭原住民並未更動原產地製品的用途，那麼淇武蘭遺址墓葬既有埋入中國黑釉或青花青花玉壺春瓶之例（同圖28、29、123），亦見陪葬在地陶玉壺春瓶，則以酒入墓似乎是淇武蘭居民的慣俗。就此而言，墓6和墓20不僅出土有青花玉壺春瓶，且均伴出青花碗或碟，故不排除以舶來的盛酒瓶和飲酒用碗成套入墓是當時人們蓄意的作為。另外，墓36、墓108等出土的安平壺也可置於此一脈絡予以掌握，這也就是說將可能是貯酒容器的「安平壺」置於墓壙一事，再次反映了當地居民以酒入墓的葬俗，特別是墓108的安平壺，出土時瓶頸仍殘留纏繞的草繩，說明入墓時瓶內貯物，並經彌封後再以繩捆綁牢固。依據報告書的記載，遺址出土的安平壺數量計約1685件，完整、略殘或半殘的安平壺也有149件之多，不難想像淇武蘭的居民生活應該是相對的富庶，土產物資不虞匱乏，才會有充足的土產去交換大量渡海來臺的進口洋酒。《熱蘭遮城日誌》1643年4月24日記載有一艘小戎克船自中國福州（Hocksieuw）載運著1500~1600罐中國麥酒和小量的珊瑚抵達雞籠，從臺灣各遺址發現安平壺標本的數量、遺址的性質以及閩北邵武是安平壺的產地之一，我認為上述運抵雞籠的千餘罐酒極有可能就是內貯燒酒的

㉔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平壺。[243] 另一方面，雖然1634年西班牙聖薩爾瓦多城（雞籠）財務報告中提到，由菲律賓運送臺灣的油、醋、葡萄酒或杏仁、糕餅及醃製食品也都是裝貯於中國陶瓷瓶甕當中，[244] 不過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許多施釉帶繫瓶甕的確實用途目前不明。

〈後記〉

本文是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所委託「淇武蘭遺址出土施釉陶瓷研究計畫」（2010年5月1日~2010年12月31日）的部份成果。計劃期間曾經得到蘭陽博物館邱秀蘭組長、曾宏民組長的諸多協助，更要謝謝李貞瑩小姐和邱水金老師提供建言。另外，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宜蘭縣立博物館、宜蘭縣史館所主辦的《探溯淇武蘭—「宜蘭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2010年12月19日），特此申明並向主辦單位致謝。

（責任編輯：陳卉秀）

[243] 江樹聲譯註，《熱蘭遮城日誌》2（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02），頁129。另外，陳宗仁也曾引用這條記事來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交易物中的Piedra可能包括珊瑚，我是自陳文的引述才查閱原書的。參見：陳宗仁，〈西班牙人佔領前北臺灣水域社會的交易活動：兼論「馬賽」人的形成〉，頁19。

[244] 李毓中，〈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臺灣史料研究》，14（1999），頁119-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三上次男
1982〈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
大分市歷史資料館
2003《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南蠻の貿易陶磁器—》，大分市：大分市歷史資料館。
三杉隆敏
1982《世界の染付》3・明後期・清，京都：同朋社。
上東克彥
2004〈鹿兒島縣薩摩半島に傳世された華南三彩—クンデイと果實形水注—〉，《貿易陶磁研究》，24。
大橋康二
1985〈鹿兒島縣次上濱採集の陶磁片〉，收入《三上次男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陶磁篇，東京：平凡社。
1997〈築町遺跡出土の陶磁器につい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2003〈萬才町遺跡出土の陶磁器〉，收入《萬才町遺跡—寺院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工藤哲司
2009〈近世初頭における仙台城下の輸入陶磁器〉，《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
王文徑
1990〈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4期。
2005《漳浦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中村孝志（賴永祥譯）
1956〈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北文獻叢刊》，2。
木村幾多郎
2003〈いわゆる「トラディスカント壺」について〉，收入《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大分市：大分市歷史資料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
2009〈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12期。
王淑津
2007〈白瓷蓋盒〉，《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上）正文篇（2004），頁27-29，後收入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0〈巴達維亞瓷的風格故事〉,《故宮文物月刊》, 328 (2010)。

王淑津等

2007〈十六至十七世紀鉛釉陶瓷初探—以台灣考古遺址出土品為例〉,《故宮文物月刊》, 1 期。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1988《平戶和蘭商館遺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告－》, 長崎縣：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出光美術館編

1987《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 東京：平凡社。

矢島律子

1996《明の五彩》中國の陶磁9, 東京：平凡社。

古湘等

1973〈介紹幾件元明青花瓷器〉,《文物》, 12期。

玉蟲玲子

1999〈紙織畫小考〉, 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朝鮮王朝, 東京：小學館。

向井亙

2003〈タイ黑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 23。

2010〈タイの陶磁史(7)—日本出土のタイ陶磁器(1)〉,《陶說》, 683。

2010〈タイの陶磁史(8)—日本出土のタイ陶磁器(2)〉,《陶說》, 684。

有田町史編纂委員會

1988《有田町史 古窯編》, 佐賀縣：有田町。

吉田寬

2004〈大分、府內から出土した東南アジア產陶磁〉, 收入《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 鹿兒島：鹿兒島大學。

2006〈豐後府內における天正十四年(1586)—據資料について—中世大友府內町跡第3次調查SX210の評價と檢討〉,《貿易陶磁研究》, 2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寬樂等)

2010〈江西南城縣黎家山古墓群和斜窠古村落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 2期。

吉良文男

2002〈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 收入茶道資料館,《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 京都：茶道資料館。

安溪縣文化館(葉清琳)

1997〈福建安溪古窯址調查〉,《文物》, 7期。

李匡悌

2005《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期末報告》,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尾崎直人
2001〈インドネシア スラウエシ島に渡った交趾燒合子—本多弘氏所藏品による〉，收入同氏編《インドネシア スラウエシ島に渡った三彩交趾燒展》，富山市：富山佐藤美術館。
李毓中
1999〈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臺灣史料研究》，14。
江樹聲譯註
2002《熱蘭遮城日誌》2，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佐佐木達夫等
2003〈ミャンマ—陶磁の發見〉，《貿易陶磁研究》，23。
吳其生等
2005《華安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2005《南靖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
2001〈首里城跡　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發掘調查報告書〉，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3集，沖繩：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
東京國立博物館
2009《染付　藍が彩るアジアの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
1990《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 II》，東京：東京美術。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1993《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2001《五島町遺跡》，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2002《金屋町遺跡　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2003《萬才町遺跡—寺院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1992《長崎家庭裁判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1997《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1999《興善町遺跡—東邦生命保險第2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2002《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3 《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2005 《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 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長崎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183集，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

金國平編譯

2005 《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林梅村

2010 〈大航海時代東西方文明的衝突與交流—15~16世紀景德鎮青花瓷外銷調查之一〉，《文物》，3期。

邱鴻霖

2004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出土墓葬研究—埋葬行為與文化變遷的觀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典藏編輯部

2010 〈晚明沉船 南澳一號〉，《典藏》，6。

津田武德

1999 〈ラオス ミャンマー陶磁概說〉，收入：《特別展—敢丁コレクション東アジア古陶磁展6》，富山市：富山佐藤美術館。

故宮博物院等（樊昌生等）

2007 〈江西景德鎮麗陽碓臼山明代紀年墓〉，《文物》，3期。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

1990 《德化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招紹璿等）

1999 〈香港澳門五十年來的考古收穫〉，《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相賀徹夫編集

1976 《世界陶磁全集》明14，東京：小學館。

柴田圭子

2003 〈愛媛縣における產地不明の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23期。

徐州博物館（盛儲彬等）

2004 〈徐州富庶街明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3期。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1983 《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瀨川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翁佳音

1999 〈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栗建安

2009 〈福建地區水下考 古20年〉，《福建文博》，增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島彥一譯注
2001《大旅行記》6，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691。
桑原憲章等
1977《濱乃館—阿蘇大宮司居館跡》熊本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21，熊本：熊本縣教育委員會。
茶道資料館編
1998《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京都：茶道資料館。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6《王城試掘研究計劃（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國分直一
1944《壺を祀る村》，東京：三省堂。
曹永和
1979〈明代臺灣漁業誌略〉，原載《臺灣銀行季刊》，6卷1期，收入同氏《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陳立群
2001〈東山島冬古沉船遺址初探〉，《福建文博》，1期。
陳有貝
2007《淡水紅毛城邊坡下陷考古試掘計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有貝等
2003〈淇武蘭遺址出土近代瓷器簡介〉，《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中心。
2007《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008《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2008《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陳宗仁
2005〈雞籠、淡水的崛起〉，收入於《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出版社。
2005〈強權在福爾摩沙島相遇〉，收入於《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出版社。
2010〈西班牙人佔領前北臺灣水域社會的交易活動：兼論「馬賽」人的形成〉，《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
陸明華
2010〈晚明福建瓷器窯業的發展〉，《南方文物》，1期。
陳建中等
2003《中國古陶瓷標本—福建德化窯》，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5《德化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陳娟英
2005《廈門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國棟
2004〈「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8。
康培德
2003〈十七世紀上半的馬賽人〉,《臺灣史研究》,10卷1期。
張彬村
2010〈臺灣早期海貿地位的興起與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收入:《東亞海域與臺灣:慶祝曹永和院士九十壽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
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等
2003《秭歸廟坪》,北京:科學出版社。
葉文程等
2001《德化窯瓷鑑定與鑑賞》,南昌市:江西美術出版社。
森本朝子
2004〈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收入:《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縄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鹿兒島:鹿兒島大學。
堺市博物館
1993《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
傅宋良等
1988〈邵武四都青雲窯調查報告〉,《福建文博》,1期。
森村健一
1994〈漳州窯系製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觀とその意義〉,收入《漳州窯出土青花、赤繪瓷與日本出土中國外》,大阪:堺市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
2007〈堺、閩南『泉南佛國』國際關係論〉,《關西考古學研究》,15。
葉清琳
1990〈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收入Ho Chui 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 81.
森達也
2009〈十五世紀後半—十七世紀の中國貿易瓷—沉船と窯址發見の新資料を中心に—〉,《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
彭縣文化館
1978〈四川省彭縣南街醬園廠出土窖藏青花瓷器〉,《文物》,3期。
齊藤菊太郎
1976《吳須赤繪 南京赤繪》陶磁大系45,東京:平凡社。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1991《博多遺跡群第60次發掘調查報告書》,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285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
1996《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愛知：愛知縣陶磁資料館。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
2010〈平潭九梁礁明代沉船遺址調查報告〉，《福建文博》，1期。
福建省博物館等
1997《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等（栗建安）
1993〈平和縣明末清初青花瓷窯調查〉，《福建文博》，1、2合期。
詹素娟
1998《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
1998《荒木町遺跡Ⅱ—宗教法人解脫會本部新築工事に伴う緊急發掘調查報告書—》，東京：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
楊豪等
1994〈廣東四會發現三座明墓〉，《考古》，2期。
趙嘉斌
2008〈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古代外銷瓷—中國水下考古的工作與發現〉，《中國古陶瓷研究》，14。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
2006《東海平潭號碗礁一號出水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
德川義宣
1982《茶壺》，京都：淡交社。
劉文山
1978《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
1991《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劉益昌等
2008〈花蓮崇德遺址的研究史：議題回顧與展望〉，收入《環臺灣地區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暨2007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臧振華等
1993〈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3分。
龜井明德
1986《九州の中國陶磁》，福岡市：財團法人西日本文化協會。
1986〈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收入《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6 〈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補遺〉，收入《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

盧泰康

2009 〈臺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4，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1997 《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謝艾倫

2009 《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明良

1995 〈安平壺芻議〉，《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

2005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臺灣史研究》，3卷1期（1996），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

2007 〈鐵釉系標本〉，《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陶瓷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上）正文篇（2004），收入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8 〈關於「清香」壺—從臺灣發現例談起〉，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

2008 〈關於玉壺春瓶〉，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

2008 〈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2007），修訂後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

2010 〈關於葉形盤—從臺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26。

2011 〈十七世紀中國赤壁賦圖青花瓷碗—從臺灣出土例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35。

簡榮聰

1994 《臺灣海撈文物》，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續伸一郎

1999 〈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9。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

1998 《航路アジアへ—鎖國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

Addis, John

1979 〈中國瓷器—序〉，收入：*South-East Asian &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g Ko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Wiraikeow, Caaruk

2002 〈タイ國シンブリー縣ノイ窯跡群發掘調查報告書〉，《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X。

Adhyatman, S. & Abu Ridho

1984 *Martavans in Indonesia*,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arbosa, Duarte
1918-21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an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Bbordering 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ir Inhabitant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Brown, Roxanna Maude
2004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rown, Roxanna M. and Sten Sjostrand,
2001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 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
Christie's
2004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ustralia: Christie's.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1992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Cole, Fay-cooper with postscript by Berthold Laufer
1912 *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1993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Desroches, Jean-Paul ed.
1996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Donnelly, P. J.
1969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Flecker, Michael
1992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21: 3.
Goddio, Franck
1988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wind first, 1988.
Green, Jeremy
1986 "The Survey of the VOC Fluit Risdam (1727), Malay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5-2.
Harrisson, Barbara
1990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orne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örg, Christiaan J. A., Michael Flecker
2001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Locsin, 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
1967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Rutland: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ore, Eine
1970 “A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Stonewares of Martabani Type,”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vol. ⅩⅧ.
Nation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2008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 off the Coast of ViteNam*, HaNoi.
Peralta, Jesus T.
1993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Philippines.
Piercy, Robin C. M.
1977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Report no. 3,”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6-4.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burn
1988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Phaidon: Christie’s Oxford.
Sjostrand, Sten
2007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Tan, Rita C.
2007 *Zhangzhou Ware-Founde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rtPostAsia Pte Ltd..
Valdes, Cynthia O.,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1992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Jar Collectors.
Van der Pijl-ketel, C. L.
1982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uem.
Volker, T.
1954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pl. Ⅶ-9.
Weacham
1990 “W. A Wing Trading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r,” JHKAS, vol. ⅩⅡ.
Wingood, Allan J.
1982 “Sea Venture. An interim report on an early 17th century shipwreck lost in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1: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青花卷草紋瓶殘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2　青花卷草紋玉壺春瓶，15世紀，日本沖繩縣勝連町濱出土。龜井明德，《九州の中國陶磁》（福岡市：財團法人西日本文化協會，1986），頁84，圖41。

圖3　青花卷草紋碗，「大明正德年製」款，口徑23.8cm，土耳其炮門宮博物館藏。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3明後期・清（東京：同朋舍，1982），單色圖版19a。

圖4　青花纏枝靈芝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1、頁175，圖279。

圖5　青花纏枝紋碗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6　青花纏枝靈芝紋碗，高6.7cm，1620-30年代，*Wanli Shipwreck*。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 128, no. 6347.

圖7　青花江濱垂釣紋盤，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82，圖318-319。

圖8　青花江濱垂釣紋盤，16世紀末至17世紀前期，日本長崎萬才町遺跡出土。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萬才町遺跡—寺院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3），頁87、頁52，圖版20-3。

圖9　青花紅綠彩牡丹紋罐殘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6、頁192，圖381右。

圖10　釉上彩牡丹紋罐，口徑9.6cm，高23.2cm，17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齋藤菊太郎，《吳須赤繪　南京赤繪》陶磁大系45（東京：平凡社，1976），彩圖2。

圖11　釉上紅綠彩變形蕉葉紋殘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2　釉上紅綠彩蕉葉紋瓶，高32.2cm，16世紀中後期，日本出光美術館藏。矢島律子，《明の五彩》中國の陶磁9（東京：平凡社，1996），圖60。

圖13　紫金釉青花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6、頁193，圖382-383。

圖14　紫金釉青花杯，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碗礁一號沉船。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碗礁一號出水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209，圖127。

圖15　青花葉紋盤，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6　青花葉紋盤，1690年代，口徑20cm，*Vung Tau Shipwreck*。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p. 121, nos. 883-886.

圖17　青花葉紋盤，「太平年興 乙卯冬記」款，17世紀後期，臺灣高雄左營鳳山舊城出土。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3分（1993），頁827，圖版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青花菊花纏枝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9 青花菊花纏枝紋碗，17世紀後期，印尼Pasar Ikan出土。三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1982），圖13-15。

圖20 青花變形蓮瓣鷺鷥紋碗，口徑18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1、頁 176，圖 282-283。

圖21 青花開光變體蓮瓣紋碗，17世紀，中國福建漳州窯五寨二壠窯址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76之5圖左。

圖22 青花開光變體蓮瓣紋碗，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盧泰康，〈臺澎地區出土十七 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4（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9），頁240，圖1之33。

圖23 青花花卉紋罐殘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24 青花花卉紋罐，高26cm，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Founde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rtPostAsia Pte Ltd, 2007), p. 152, pl. 150.

圖25 青花花卉紋繫耳大口罐，高34cm，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Jean-Paul Desroches ed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1996), p. 357.

圖26 青花纏枝花卉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27 青花纏枝花卉紋碗，日本肥前天狗谷窯Ⅲ期（1650－1690）。有田町史編纂委員會，《有田町史　古窯編》（佐賀縣：有田町，1988），圖版78之2。

圖28 青花玉壺春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9、頁186，圖343。

圖29 青花玉壺春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86，圖342。

圖30 青花開光花卉紋盤，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76、頁162，圖196。

圖31 青花開光花卉盤，口徑22.0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76、頁162，圖196。

圖32 青花開光花卉盤，17世紀，中國福建漳州窯出土。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等（栗建安），〈平和縣明末清初青花瓷窯址調查〉，《福建文博》，1993年1、2合期，頁164，圖2之2。

圖33 青花開光花卉鳳紋盤，17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C. L. van der Pijl-Ketel ed.,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uem, 1982), p. 201, no. 118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4　青花開光花卉紋盤，17世紀前期，日本平戶荷蘭商館遺跡出土。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告—》（平戶：平戶市教育委員會，1988），頁93圖版22之5。

圖35　青花「福」字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6-2、37-1、96-2。

圖36　青花「壽」字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9-5、9-6、16-2、38-1、67-1、74-2、96-2。

圖37　青花「魁」字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 16-2、49-2、65-2、96-2。

圖38　青花「壽」字盤，口徑9.8cm，16世紀末至17世紀前期，日本長崎榮町遺址。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栄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圖版12之30。

圖39　青花「壽」字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79-80、頁166，圖224、225。

圖40　青花「壽」字碗，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中國福建漳州窯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15之5圖左下。

圖41　青花「壽」字碗，口徑12.0cm，足徑4.5cm，高5.5cm，清康熙四十年（1701）歿，中國福建漳浦黃性震墓出土。王文徑，〈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 年4期，頁72，圖2之4。

圖42　青花「壽」字碗，口徑12.0cm，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中國福建漳浦石榴鄉墓出土。王文徑，〈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4期，頁72，圖2之6。

圖43　青花龍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44　青花螭龍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6、頁182，圖317。

圖45　青花螭龍紋碗，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初期，中國福建漳州窯碗窯山窯址（左）、大壠窯址（右）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31之5、74-2。

圖46　青花螭龍紋碗，口徑11.4cm，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前期，日本長崎勝山町遺址出土。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圖版11之8。

圖47　青花加官受祿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48　青花加官受祿紋碗，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前期，中國福建漳州窯大壠窯址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74之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9 青花赤壁賦故事人物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74，圖272。

圖50 青花後赤壁賦故事人物紋碗，口徑17.9cm，17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染付　藍が彩るアジアの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9），頁70，圖60。

圖51 青花騎馬人物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1、頁174，圖273。

圖52 青花騎馬人物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53 青花騎馬人物紋碗，16世紀前期，*Gujangan Shipwreck*。Roxanna M. Brown &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Museum, *The Tak—Omkoi Burial Sites*, 2004.

圖54 青花騎馬人物紋碗，口徑14cm，中國湖北省秭歸廟坪，明萬曆十三年（1585）墓出土。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等，《秭歸廟坪》（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249，圖208及圖版82-4。

圖55 青花魁星點斗紋盤，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7、頁182，圖320。

圖56 青花魁星點斗紋盤，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前期，中國福建漳州窯坪水窯出土。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圖版15之5及頁23，圖13。

圖57 青花魁星點斗紋盤，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前期，日本仙台市元袋遺跡出土。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圖版11之9。

圖58 青花排點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5、頁177，圖290、291。線描圖參見頁85、86，碗19。

圖59 青花排點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87、頁183，圖324下左、325下左。

圖60 青花弦紋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61 青花弦紋平底小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62 青花小罐，17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Christie's Australia,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ustralia: Christie's, 2004), no. 1047, p. 31, pl. 168-178.

圖63 青花弦紋碗，口徑10.0cm，17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Christie's Australia,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ustralia: Christie's, 2004), p. 71, pl. 652.

圖64 五彩開光花葉紋盤，口徑32.0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1、頁188，圖352-353，五彩大盤。線繪圖參見頁92，圖22盤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5　五彩折枝花卉紋盤，口徑38.1cm，17世紀，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7），頁28，圖15。

圖66　五彩花草紋盤，口徑20.4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1、頁188，圖354，五彩網格花草書紋盤。線描圖參見頁92，圖22盤2。

圖67　五彩花卉瑞獸紋盤，17世紀，日本愛知縣陶磁資料館藏。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吳州赤 繪、吳州染付、餅花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6），頁17，圖15。

圖68　青釉釉上彩鳳鳥紋盤，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69　五彩山水鳳鳥紋大盤，口徑22.7cm，17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Ⅱ》（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115，圖446。彩圖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前引《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頁16，圖9。

圖70　五彩花鳥紋廣口豐肩罐殘片，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92，圖378，五彩大瓷瓶。線描圖參見頁95，圖24。

圖71　五彩花鳥紋罐，高21.3cm，17世紀，日本出光美術館藏。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明14（東京：小學館，1976），頁240，圖248；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904。

圖71b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標本（左）與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品局部（右）花鳥紋飾比較。

圖72　青花五彩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2，圖版381左。

圖73　厚胎安平壺，高14.4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154，圖150、151。

圖74a　薄胎安平壺，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193，圖M036-7。

圖74b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墓葬（M36）出土安平壺。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192，圖M036-5。

圖75　淇武蘭遺址出土安平壺剖面圖。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 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68，圖12安平壺剖面圖。

圖76　安平壺，頸折處有草繩纏繞，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墓葬（M108）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209，圖M108-7。

圖77　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再以藤莖捆繞壺頸加固的安平壺，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Christiaan J. A. Jö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2001), p. 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8 福建邵武窯採集白瓷標本，臺灣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79 厚胎安平壺，17世紀後期，高15.6cm，中國江西南城縣黎家山七號墓出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寬樂等），〈江西南城縣黎家山古墓群和斜窠古村落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10年2期，頁52，圖11-3。

圖80 白瓷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9、頁196，圖版400。

圖81 白瓷蓋，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9、頁196，圖402。

圖82 德化窯印花模具與白瓷蓋盒，17世紀。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Faber, 1969), pl. 46-A.

圖83 白瓷蓋，17世紀至18世紀初，口徑6.8m，日本長崎勝山町出土。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圖版12之21。

圖84 白瓷蓋，1620年代，*Wanli Shipwreck*。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 249, no. 7397下.

圖85a-b白瓷貼花鋪首啣環長頸瓶，高22.8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M40）。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8、頁194，圖394，白瓷盤口瓶。線描圖參見頁98-99，圖26瓶1。

圖85c 白瓷貼花鋪首啣環長頸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墓葬（M40）出土情況。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205，圖M040-3。

圖86 白瓷板狀花式耳長頸瓶，高20.0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98、頁194，圖395。線描圖參見頁99，圖26瓶2。

圖87 白瓷釉下鐵繪瓶，「崇禎己卯」（1639），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藏。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l. 6-C.

圖88 白瓷長頸瓶，「正德己卯」（1519），高16.5cm。陳建中等，《中國古陶瓷標本—福建德化窯》（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72，圖95。

圖89 白瓷長頸瓶，「萬曆丁巳」款（1617），高13cm。陳建中等，《中國古陶瓷標本—福建德化窯》（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73，圖96。

圖90 青釉碗，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91 青釉碗，17世紀，中國福建華安窯址出土。吳其生等，《華安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35。

圖92 青釉碗，口徑13.0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00、頁196，圖404、405。線描圖參見頁100-101，圖27深腹碗。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93　青釉碗（中），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Jean-Paul Desroches ed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1996), pp. 354-355.

圖94　青瓷小口豐肩罐，高18.5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圖408、409。

圖95　青瓷小口豐肩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96　青瓷小口豐肩罐殘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108-113，圖版M085-7。

圖97　青瓷罐，高38cm，17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Ⅱ》（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137，圖535。

圖98　廣口四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99　廣口四繫罐，高16.5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4。

圖100　廣口四繫罐，高24.8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3。

圖101　廣口四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02　廣口四繫罐，高24.7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2。

圖103　廣口四繫罐，高26cm，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C. L.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p. 229, no. 12131; p. 230, no. 12156; p. 242, no. oks 1977/108.

圖104　廣口四繫罐，高28cm，17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49, no. 380-383.

圖105　唇口長頸溜肩罐，口徑18.0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200圖版426。

圖106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臺灣海峽打撈出水品。簡榮聰，《臺灣海撈文物》（教育部等，1994），頁64。

圖107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高34.3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106-107、頁200，圖版427。

圖108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左香」陽紋字銘，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106-107、頁201，圖版431。

圖109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高38.0cm，16世紀末至17世紀，日本大阪堺市出土。堺市博物館，《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1993），頁41，圖F26。

圖110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日本東京新宿荒木町遺跡出土。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荒木町遺跡Ⅱ—宗教法人解脫會本部新築工事に伴う緊急發掘調查報告書—》（東京：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1998），卷頭圖版4之右上。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1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高52.5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5圖版450。

圖112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16世紀後期以後，日本愛媛縣湯築城跡出土。柴田圭子，〈愛媛縣における産地不明の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23期（2003），頁46圖中，B Type。

圖113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高51cm，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 pp. 237-238.

圖114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臺灣國立博物館藏。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頁54圖68，編號AH3901。

圖115 黑褐釉唇口四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16 黑褐釉五繫罐，高32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6圖版454。

圖117 黑褐釉五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18 黑褐釉無頸五繫罐，口徑10.8cm，高34.8cm，中國廣東省四會明代墓葬出土。楊豪等，〈廣東四會發現三座明墓〉，《考古》，1994年2期，頁189，圖2之1。

圖119 黑褐釉五繫罐，「清香」銘，16至17世紀，日本私人收藏。德川義宜，《茶壺》（京都：淡交社，1982），圖151及頁224-225的解說。

圖120 黑褐釉五繫罐，1600年，高50cm，*San Diego Shipwreck*。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1993), p. 85, pl. 25. Jean-Paul Desroch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uem of the Philippines, 1996), p. 249.

圖121 黑褐釉五繫罐，口徑10.5cm，16至17世紀，西沙群島打撈。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頁61。

圖122 黑褐釉玉壺春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4、416。

圖123 黑褐釉玉壺春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5、417。

圖124 黑褐釉貼花變形蓮瓣紋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17、頁226圖版567。

圖125 I式褐釉龍紋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7圖版456。

圖126 褐釉龍紋罐，高59cm，16至17世紀，菲律賓私人藏。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Jar Collectors, 1992), p. 126, no. 62.

圖127 II式褐釉龍紋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7，圖版4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8　褐釉龍紋罐，高60.4cm，16至17世紀，菲律賓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氏藏。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Rutland: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p. 195, pl. 218; p. 196, no. 220.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24, no. 59.

圖129　褐釉龍紋罐，高55cm，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Jean-Paul Desroches ed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2.

圖130　III式褐釉龍紋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31　褐釉獸面縱繫龍紋罐，高42cm，16至17世紀，東南亞私人藏。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18, no. 46-47.

圖132　IV式褐釉龍紋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33　褐釉龍紋罐，高52cm，17至18世紀，菲律賓私人藏。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 133, no. 76.

圖134　V式褐釉龍紋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35　褐釉龍紋罐，高59 cm，17至18世紀，婆羅洲Sabah Museum藏。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urneo*, pl. 73.

圖136　褐釉菊形縱式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37　褐釉菊形縱式繫鳳鳥紋罐，高53cm，16至17世紀，婆羅洲私人藏。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urneo,* pl. 9b.

圖138　褐釉陰刻人物紋帶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39　褐釉陰刻人物紋六繫罐，高70cm，16至17世紀，婆羅洲Sabah Musuem藏。Barbara Harrisson, *Pusaka Heirloom Jars of Burneo*, pl. 75.

圖139b 同上陰刻人物線繪圖。

圖140　褐釉貼花人物紋帶繫罐，高69cm，16至17世紀，東南亞私人藏。S. Adhyatman & Abu Ridho, *Martarans in Indonesia*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4), p. 94, pl. 19.

圖141 褐釉罐殘件「之表德」銘款，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42　黑褐釉變形蓮瓣紋折肩罐，口徑9.1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10、頁210，圖版473。

圖143　黑褐釉變形蓮瓣紋折肩罐，高40cm，中國江蘇省徐州富庶街明代住居址出土。徐州博物館（盛儲彬等），〈徐州富庶街明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004年3期，圖版13之5。

圖144　鉛綠釉葫蘆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5 鉛綠釉軍持，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584。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71，圖M075-8。

圖146 三彩軍持，16世紀後期，高14.8cm，日本九州鹿兒島縣薩摩半島傳世品。上東克彥，〈鹿兒島縣薩摩半島に傳世された華南三彩—クンデイと果實形水注—〉，《貿易陶磁研究》，24（2004），頁173，圖2及頁176，圖1。

圖147 褐釉軍持口頸部位，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8），頁120、頁230，圖586、587。

圖148 軍持素燒坯口頸部位殘件，中國福建省漳州平和窯址出土。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京都：茶道資料館，1998），頁118，圖99。

圖149 綠釉盒蓋，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2。

圖150 三彩印花盒蓋，17世紀，口徑6.1cm，底徑4.0cm，高4.4cm，日本傳世品。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京都：茶道資料館，1998），頁68，圖61。

圖151 綠釉盒蓋，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20、頁229圖版581。

圖152 綠釉盂式蓋盒，口徑5.9cm，高4.4cm，中國福建省平和田坑窯出土。茶道資料館編，《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頁104，圖60。

圖153 三彩陰刻蓮瓣紋殘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54 三彩玉壺春瓶，16世紀，高15cm，日本九州熊本縣濱乃館遺跡出土。大分市歷史資料館，《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南蠻の貿易陶磁器—》（大分市歷史資料館，2003），頁18，圖46。

圖155 三彩注壺殘件，16世紀，日本沖繩首裏城木曳門、廣福門地區出土。大分市歷史資料館，前引《豐後府內　南蠻の彩り—南蠻の貿易陶磁器—》，頁14圖34。

圖156 無頸四繫罐，16至17世紀，泰國Singburi地區Noi河窯窯址出土。Caaruk Wiraikeow，〈タイ國シンブリー縣ノイ窯跡群發掘調查報告書〉，《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X（2002），頁200。

圖157 泰國Noi河窯系無頸四繫罐，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向井亙，〈タイ黑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23（2003），頁102。

圖158 泰國無頸四繫罐，1613年，高50cm，*Witte Leeuw Shipwreck*。C. L.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p. 239, no. 12211，左下圖。

圖159 泰國Noi河窯系帶頸四繫罐，高58.8cm，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8圖版461。

圖160 泰國Noi河窯系四繫罐，16至17世紀，日本沖繩縣久米島墓葬出土。謝明良，前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頁270-271，及向井亙，〈タイの陶磁史（8）—日本出土のタイ陶磁器（2）〉，《陶說》684（2010.3），頁55圖1。

圖161　臺灣排灣族內文社（Chakobokoji社）相片所見泰國黑釉四繫罐。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瀨川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3），頁74，左上圖。

圖162　緬甸黑釉繫耳殘件，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宜蘭縣文化局提供。

圖163　黑釉飾白泥連珠和堆線紋Martaban Jar，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Jean-Paul Desroches ed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1996), p. 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